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九十三本，第四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

清朝與喀爾喀蒙古的政教互動 (1723-1733)——以二世哲布尊丹巴 靈童選定及其遷居多倫諾爾為中心

楊奇霖*

在清朝中前期與喀爾喀蒙古的關係演變中，二世哲布尊丹巴靈童（呼畢勒罕）選定一事具有重要影響。對此經過記述最詳者是佚名《哲布尊丹巴傳》(1859)。書中諸多細節與十九世紀以來出現的多種哲布尊丹巴傳記存在文本聯繫。一世哲布尊丹巴托夢雍正帝、西藏喇嘛認證呼畢勒罕等情節，最早見於納吉旺布所作藏文「聖傳」《善緣信者之車》(1839)和《白蓮美鬘》（約 1848-1851）中；而二世哲布尊丹巴的出生時間和地點、雍正帝的相關諭旨，則應參考了《溫都爾格根源流及彼時滿洲皇帝諭旨等重要事項彙寫冊》(1833)、《聖上源流》(1853) 等官方「史傳」。事實上，各類傳記所言喀爾喀各部的競爭、西藏喇嘛的認證、清朝皇帝的夢境、賞賜驛站等要素，還可從清代檔案中找到源頭。這些檔案反映出雍正時期清廷在喀爾喀內部紛爭中「終審者」的身份。雍正帝選定敦多布多爾濟之子作為轉世靈童，除尊重西藏意見、滿蒙聯姻等考量外，或與敦多布多爾濟既可牽制土謝圖汗勢力又能力平庸易於控制有關。雍正十年 (1732)，為防範準噶爾搶奪二世哲布尊丹巴，雍正帝令其遷居多倫諾爾。趁「小喇嘛」年幼之機，「大皇帝」進一步將哲布尊丹巴的宗教權威納入清朝政治秩序中，成為清廷管理喀爾喀的權力資源。

關鍵詞：二世哲布尊丹巴 蒙古佛教 雍正帝 喀爾喀

* 上海大學文學院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21CZJ008) 階段成果。

一・前言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 (*jibzundamba qutuγtu*) 是清代喀爾喀蒙古藏傳佛教的最高宗教領袖，該世系始於喀爾喀土謝圖汗袞布多爾濟 (*gümbü dorji*) 之子札那巴咋爾 (*janabazar*, 1635-1723)，蒙古各部多稱其為溫都爾格根 (*öndür gegen*) 或博格達格根 (*boyda/boydo gegen*)，意為「至高光明」與「至聖光明」。札那巴咋爾五歲時坐床、受戒，法名羅布桑丹貝堅贊 (*blo bzang bstan pa'i rgyal mtshan*)，後入藏從五世達賴喇嘛處獲得哲布尊丹巴（亦作澤卜尊丹巴、折卜尊丹巴等）之號，即藏語 *rje btsun dam pa*（聖賢尊者）之音譯，是為一世哲布尊丹巴。¹ 自康熙初年開始，喀爾喀左右翼之間的內訌愈演愈烈，支持右翼扎薩克圖汗部的衛拉特蒙古準噶爾部趁機東擴，於康熙二十七年 (1688) 攻入土謝圖汗部腹地，焚毀哲布尊丹巴的寺廟——額爾德尼召。軍事上走投無路的左翼各部在哲布尊丹巴率領下歸附清朝。一方面，哲布尊丹巴亟需清軍的保護以抗衡衛拉特蒙古，鞏固自己在喀爾喀的宗教地位與權威；另一方面，清廷也需要利用哲布尊丹巴來制衡或消解當時尚未完全掌控的西藏達賴喇嘛教權在蒙古地區的巨大影響。² 康熙三十年 (1691)，清朝與喀爾喀各部在多倫諾爾進行會盟，喀爾喀正式併入清帝國版圖。不久之後，康熙帝「封澤卜尊丹巴胡圖克圖為大喇嘛，於喀爾喀地方立為庫倫，廣演黃教」。³ 康熙五十七年 (1718)，又稱哲布尊丹巴「堪為喀爾喀黃教之

¹ dzaya pandita blo bzang 'phrin las 羅布桑普棱列，“*Rje btsun dam pa blo bzang bstan pa'i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i khrungs rabs bco lnga'i rnam thar*” 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傳, in *Life and Works of Jebtsundampa I*, ed. Lokesh Chandra, Śāta-Pitaka Series, vol. 294 (New Delhi: Sharada Rani, 1982), pp. 435-440；金成修，《明清之際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的傳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186-191；無名氏著，申曉亭、成崇德譯註，〈哲布尊丹巴傳〉，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編，《清代蒙古高僧傳譯輯》（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頁 217-236。最近 Uranchimeg Tsultemin 的研究則認為僅僅依靠羅布桑普棱列所作傳記及後世繪製的官方畫像來論定其格魯派身分並不合適，一世哲布尊丹巴試圖在蒙古建立的是一個更具包容性的藏傳佛教傳統，並堅持一世哲布尊丹巴與覺囊多羅那他之間的聯繫，參看 Uranchimeg Tsultemin, *A Monastery on the Move: Art and Politics in Later Buddhist Mongol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20), pp. 81-105.

² 楊奇霖，〈佛法與王法：佛教在清帝國身份認同中的作用——以康熙朝喀爾喀蒙古一世哲布尊丹巴為中心〉，釋妙江等主編，《身份認同及群體建構——第四屆五臺山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9），頁 216-256。

³ 清理藩院編，趙雲田點校，《乾隆朝內府抄本《理藩院則例》》（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頁 118。

領袖」，「如今對於佛法大有補益之人，除爾以外無他」云云。⁴ 有了清朝的支持，一世哲布尊丹巴的權威從左翼地區逐漸擴大至喀爾喀全部；與此同時，清廷對漠北蒙古時局之影響也不斷深入。

雍正元年（1723）正月，前來弔唁康熙帝的一世哲布尊丹巴在北京圓寂。理藩院奏稱：「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原係法教內之第一人……當噶爾丹叛亂時，身率七旗之喀爾喀等來歸，最為有功。伊係喀爾喀汗之子、土謝圖汗之弟……泊然示寂，請照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得尼之例，給賜名號、印、冊，以示優典。」⁵ 雍正帝覆准：「澤卜尊丹巴胡圖克圖，應照班陳、達賴喇嘛之例，給與封號，賜金印敕，授為『啟法澤卜尊丹巴喇嘛』」。⁶ 伴隨著給予哲布尊丹巴世系更高規格的冊封，清廷對喀爾喀佛教事務以及活佛個人的政治掌控也開始加強。這直接體現在二世哲布尊丹巴與清朝的政教往來上。相較於學界對一世哲布尊丹巴的豐富研究，⁷ 圍繞二世活佛的討論更多地集中於他在乾隆朝喀爾喀青濱雜卜撤驛之變中的表現以及由此引發的哲布尊丹巴世系轉生西藏之事。⁸ 對於雍正時期二世哲布尊丹巴靈童的選定紛爭及其移住多倫諾爾等問題仍有值得討論之處。

雍正五年（1727）十一月分下《起居注冊》「十八日庚午」條載，理藩院遵旨議奏：「喀爾喀王、達錫等差往西藏班禪、達賴喇嘛等處使者將澤卜尊丹巴胡圖克圖緣由問明請封。應如所請，將額駙敦多卜多爾濟之子封為澤卜尊丹巴胡圖克圖胡畢爾汗。」於是雍正帝「召入王大臣等」商議，認為「應封於庫倫地

⁴ 黃成垿口述，陳錄筆譯，《蒙古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頁 57；札奇斯欽，《蒙古與西藏歷史關係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學報叢書編譯委員會，1991），頁 630。

⁵ 《世宗憲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三，雍正元年正月丙申（十六日），頁 85。

⁶ 清理藩院，《乾隆朝內府抄本《理藩院則例》》，頁 118。

⁷ 相關研究綜述參看散·楚侖、烏雲畢力格，〈蒙古國所藏有關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蒙古文傳記文獻〉，烏雲畢力格、散·楚侖編，《蒙古國藏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蒙古文傳記彙集》（赤峰：內蒙古科學技術出版社，2020），頁 1-4；烏日圖，〈哲布尊丹巴一世研究綜述〉，《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11.2：21-25；烏日圖，〈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政治活動研究〉（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12）；Agata Bareja-Starzyńska, *The Biography of the First Khalkha Jetsundampa Zanabazar by Zaya Pandita Luvsanprinlei* (Warsaw: Elipsa Dom Wydawniczy, 2015).

⁸ 森川哲雄，〈外モンゴルのロシア帰属運動と第 2 代ジェツンダムバ・ホトクト〉，《歴史学・地理学年報》9 (1985)：1-40。

方」。⁹這是目前所見有關二世哲布尊丹巴呼畢勒罕最早的漢文記錄。其後，乾隆朝內府抄本《理藩院則例》、四庫本《大清會典則例》等政書皆據此逐錄。¹⁰從這些史料呈現的過程來看，喀爾喀遣使、西藏認看、清廷冊封，一切按部就班，並無波瀾。然而事實上，不僅喀爾喀蒙古內部圍繞二世哲布尊丹巴人選的明爭暗鬥早已開始，清廷也介入其中，且扮演重要角色。

對於這段紛爭，學界已有關注。無論是早期波茲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的蒐羅，還是妙舟《蒙藏佛教史》的轉述，抑或後來學者的研究，主要依據的都是佚名所著蒙古文《哲布尊丹巴傳》中的記載。¹¹值得注意的是，作為記錄歷輩哲布尊丹巴事蹟的傳記，《哲布尊丹巴傳》並非成於一人或一時，而是具有「續纂」屬性和「層累」的特點。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還有多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蒙、藏文傳記陸續寫定。相較於漢文史料，多語種文獻是否能為我們提供這位蒙古佛教領袖更加豐富的個人信息？諸文本間又是否存在聯繫？這是本文首先要討論的問題。

傳記文獻以外，清代滿文檔案中也留下二世哲布尊丹巴的身影，其中不少都關涉雍正十年（1732）他在清廷安排下從外蒙古的庫倫移居內蒙古的多倫諾爾一事。雍正帝因何謀劃？如何推動？喀爾喀又作何反應？呈現出清廷與喀爾喀之間怎樣的政教權力互動？論及大清統治與藏傳佛教之關係，乾隆帝《喇嘛說》中「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云云常被提起，由此發展出藉佛教而統馭蒙藏的「工具論」。¹²近年來亦有學者對此意見進行反思，如石濱裕美子主張用「菩薩與轉

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起居注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1588-1590。

¹⁰ 清理藩院，《乾隆朝內府抄本《理藩院則例》》（頁 119）：「（雍正）五年具奏：達錫吹品爾托音奉使西域，齎回班陳、達賴喇嘛之文，稱澤卜尊丹巴胡圖克圖再生，眾喀爾喀遣使請封，應將額駙敦多卜多爾濟之子，准為澤卜尊丹巴胡圖克圖之胡畢爾汗。奉旨：理藩院奏請勅封澤卜尊丹巴胡圖克圖之後身，澤卜尊丹巴胡圖克圖，其鍾靈原有根源，乃與達賴喇嘛、班陳額爾德尼相等之大喇嘛也，衆喀爾喀皆尊敬供奉。且其所居庫倫弟子甚衆，著動用帑銀十萬兩修建大刹，封伊後身。」並見《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24 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卷一四二，〈理藩院・典屬清吏司〉，頁 504。

¹¹ 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頁 377-396；趙相璧，〈簡論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清代蒙古高僧傳譯輯》，頁 372-383；Baboo Jokiyaba 八寶，*cīng ulus kīged jībzundamba qutuytu* 清朝與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頁 63-73。

¹² 張羽新，《清政府與喇嘛教》（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頁 340。

輪王」、「佛教政治」(törü šasin) 等佛教世界王權觀來理解滿蒙藏之間的政教關係，指出十七世紀下半葉到十八世紀初滿蒙藏之間的戰爭與和平，都是在佛教政治的框架下進行；¹³ 艾鴻展 (Johan Elverskog) 則對佛教作為工具的有效性提出質疑，認為佛教在身分認同中的作用有被誇大之嫌；¹⁴ 而 Uranchimeg Tsultemin 試圖從蒙古建築和視覺藝術的角度挑戰以往主要基於藏文文本和清朝文書所形成的「清朝—格魯派」(Qing-Géluk) 敘述視角，強調自一世哲布尊丹巴以來喀爾喀通過對大庫倫的不斷打造以構築屬於蒙古的政教權力文化。¹⁵ 這些觀點的差異，既是視角、方法、材料不同所致，也與選取案例的時段、地域、人物有關。有清一代，滿洲統治者與蒙藏佛教的權力關係乃是不斷角力、協調、突變的動態過程，恐難一概而論。那麼，在被視為「清朝最為關鍵的轉捩時期」的雍正一朝，¹⁶ 具體情況如何？

本文旨在通過對相關傳記和檔案的梳理，考察發生在雍正年間的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畢勒罕人選認定及遷居多倫諾爾等事件，由此進一步討論雍正時期清朝與喀爾喀蒙古之間的政教互動。文中非漢文文本的拉丁字母轉寫方案，滿文依穆麟德轉寫，蒙古文採鮑培氏轉寫，藏文用威利轉寫。

二・哲布尊丹巴傳記文本的梳理

道光十三年 (1833)，理藩院咨文駐庫倫辦事大臣衙門，言及「新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共二十世代之傳記及源流」，¹⁷ 所指應即當年寫成的【Y1】《溫都爾

¹³ 石濱裕美子，《チベット仏教世界の歴史的研究》（東京：東方書店，2001），頁 363-365。

¹⁴ Johan Elverskog, *Our Great Qing: The Mongols, Buddhism and the St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pp. 1-13.

¹⁵ Tsultemin, *A Monastery on the Move*, pp. 43-80. 不同於石濱裕美子，Tsultemin 認為哲布尊丹巴試圖在喀爾喀建立的「佛教政治」(shasin tör) 與藏傳佛教傳統的「政道二途」(Mon. qoyar yosu; Tib. lugs gnyis) 概念明顯不同，後者是宗教與世俗權威的平等融合，而前者更側重世俗的權力，對現實中的喀爾喀大庫倫來說，既受到清朝的影響 (pp. 10, 106-142)，也旨在彰顯蒙古的主體性 (pp. 176-212)。

¹⁶ 宮崎市定，《雍正帝》（東京：岩波書店，1950），頁 3, 150-168；Pei Huang, *Autocracy at Work: A Study of the Yung-cheng Period, 1723-173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1-23.

¹⁷ 烏雲畢力格、散·楚侖，《蒙古國藏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蒙古文傳記彙集》，頁 181, 217。

格根源流及彼時滿洲皇帝諭旨等重要事項彙寫冊》(öndür gegen-ü uy eke kiged tere üy-e-yin manju-yin qayad-un jarliy tusiyal metü-yin čiqula kereg jüyil-i čuylarayulun bičigsen debter)，這是筆者目前所見記載二世哲布尊丹巴信息且具有明確寫定年代的非漢文史料中最早的一部。該文獻具有官方史書及備忘錄的性質，主要收錄皇帝的諭旨及政府機構間的往來文書，對哲布尊丹巴生平的記述較為簡略，如記載二世哲布尊丹巴的出生僅云：「十七世名羅布桑丹彬多密，雍正二年在喀爾喀之地敦多布多爾濟家裡轉世。」(arban doluduyar türül ün ner-e lobsangdambidongmi. nayiraltu töb ün qoyaduyar on, qalq-a-yin γajar tur dondubdorji yin ger tür qubilyan γarba.)¹⁸ 根據《額爾德尼召史》(erdeni juu-yin teüke)，擅長作畫的額爾德尼召法臺多爾濟阿齊圖綽爾濟 (dorji ačitu čorji) 曾按照一世格根的意願 (taγalal)，為其創造出此前在印度、西藏轉生的十五代世系，加上轉生於蒙古的這一輩，共十六代。(enedkeg tübed-tü qubilaju yabuysan arban jiryuyan düri-nü nirwa-ni öberün bey-e-beber bötegejü)¹⁹ 這與達賴、班禪等格魯派活佛譜系一樣，都將源流追溯至釋迦牟尼時代的印度，以此建構其神聖性。²⁰ 因此，二世哲布尊丹巴在傳記中多被稱作第十七世。

與之近似的記載還有道光二十一年 (1841) 編成的蒙古史書【Y2】《寶貝念珠》(erdeni-yin erike kemekü teüke bolai)，²¹ 補充了其生母的名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十七世名羅布桑丹彬多密，雍正二年在喀爾喀之地額駙王敦多布多爾濟家中，從夫人察罕達拉巴雅爾圖那裡轉世。」(jibzundamba qutuytu-yin arban doluduyar türül ün ner-e lobsangdambidongmi nayiraltu töb ün qoyaduyar on köke luu jil qalq-a-yin γajar ulus un efü wang dondubdorji yin ger tür qatun čayan dar-a bayartu ača qubilyan γarbai)²²

¹⁸ 烏雲畢力格、散·楚侖，《蒙古國藏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蒙古文傳記彙集》，頁189。

¹⁹ Čendin-a sudulun (Публикация Цендиной), emkidkebe., erdeni juu-yin teüke (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17），頁70-73。

²⁰ 關於班禪、哲布尊丹巴和章嘉的先世源流，參看釋妙舟，《蒙藏佛教史》（揚州：廣陵書社，2009），頁119-121, 147-148, 180-186。

²¹ 關於《寶貝念珠》的成書時間，書末所寫為道光二十一年 (1841)，且未涉及一八四二年第五世哲布尊丹巴的圓寂。書中有個別爵位承襲者出現了後來的情況，應是作者或後人抄寫時有所修改。見胡斯冷，〈戈拉登《寶貝念珠》史源與史料價值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蒙古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4），頁5-6。

²² Галдан, Эрдэнийн Эрих Хэмээх Түүх Болой (Улаанбаатар: Соёмбо Принтинг, 2006), p. 668.

幾乎在噶爾丹 (yaldan) 編訂《寶貝念珠》的同時，後來獲封庫倫堪布諾門罕 (khu re'i mkhan po no min han) 的喀爾喀蒙古僧人納吉旺布 (ngag gi dbang po, 即 ngag dbang ye shes thub bstan, 1807?/1815~1889/1897) ²³ 於道光十九年 (1839) 完成了一世哲布尊丹巴的藏文傳記【Y3】《善緣信者之車》(bzang dad pa'i shing rta)。該書除收入納吉旺布文集的藏文刻本外，德國蒙古學家坎普菲 (Hans-Rainer Kämpfe) 還曾影印刊布其蒙古文抄本 “sayin qubitan-u süsüg-ün terge”。在一世格根於北京圓寂之後，該傳記緊接著說道：

manzusiri ejen qayan-u sonur tur öcibesü sedkil yekede čilejü. ġarlıy eče minu jegüdün-tü kögsin qutuy-tu mutur-iyar tayař tur sitügseger wang don grub rdo rje yin ger tü odugsan i jegüdülbei. qubilyan tende ögede bolugsan mön bolultai. gebeču töbed tür elci ġaruju qubilyan i erikü keregtei kemen ġarlıy bolju.²⁴

文殊師利大皇帝聽聞[活佛圓寂]十分悲傷，下旨云：我夢到老呼圖克圖拄著拐杖進入王頓珠多吉（敦多布多爾濟）之家，其呼畢勒罕或轉生於此。
但須派遣使者前往西藏尋找呼畢勒罕。

雍正帝下旨遣使西藏尋求驗證呼畢勒罕的記載正與《雍正朝起居注冊》及後來各類政書中「奉使西域，齎回班陳、達賴喇嘛之文」云云相呼應。²⁵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旨在凸顯活佛神聖性的「聖徒傳記」(hagiography) 中首次出現了皇帝夢到老呼圖克圖轉生於敦多布多爾濟之家的情節。有學者指出，該傳記主要

²³ BDRC P259，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 (<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P259?uilang=bo>)。參見 Mi nyag mgon po 木雅貢布，“Ngag dbang ye shes thub bstan gyi rnam thar mdor bsdus,” in *Gangs can mkhas dbang rim byon gyi rnam thar mdor bsdus* 歷代藏族學者小傳（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第 1 冊，頁 671-672。關於納吉旺布即 Ngag dbang ye shes thub bstan 的討論，見：Agata Bareja-Starzyńska, “The Mongolian Incarnation of Jo nang pa Tāranātha Kun dga' snying po: Öndör Gegeen Zanabazar Bio bzang bstan pa'i rgyal mtshan (1635-1723): A case study of the Tibeto-Mongolian Relationship,” *The Tibet Journal* 34/35 (2010): 243-261.

²⁴ ngag gi dbang po (Ngag dbang ye shes thub bstan), “tügemel-ün ejen mandal-un itegel rje bcun dam ba blo bzang bstan bai rgyal mčan-u čadig sayin qubitan-u süsüg-ün terge kemegdekü orosiba. ff. 60r,” in Hans-Rainer Kämpfe, “Sayin qubitan-u süsüg-ün terge: Biographie des 1. rJe bcun dam pa-Qutuqtu Öndür gegen (1635-1723), verfasst vor Ngag gi dban po 1839. 2. Folge,”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15 (1981): 379.

²⁵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起居注冊》，頁 1588；清理藩院，《乾隆朝內府抄本《理藩院則例》》，頁 119。

揚奇霖

參考了羅布桑普棱列 (blo bzang 'phrin las) 於十八世紀初為其師所作傳記，²⁶ 但由於後者記事止於一七〇二年，因此，對於一七二二年一世格根進京及其圓寂之後的情形，納吉旺布應另有所本。²⁷

大約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之間，²⁸ 納吉旺布又彙集前六世哲布尊丹巴簡略生平，完成【Y4】《白蓮美鬢》(pad dkar phreng mdzes)。筆者所據即其庫倫版文集中的藏文印本，該文本在述及二世哲布尊丹巴的部分雖漫漶不清，但依然可以辨認出如下信息：

... Skyabs [mgon] sku 'phreng gnyis ... khal kha g.yon ru han ... nye char 'u kwe mur zhes grags par yab e phu wang tshe dbang don grub rdo rje dang, gong ma nA'i ral thu rgyal po'i mnal lam dang, lha blama'i lung bstan mthun pas ngos 'dzin mdzad.²⁹

……怙主二世……最近於喀爾喀左翼汗部……額駙王策旺頓珠多吉（敦多布多爾濟）[家中轉生]，在雍正皇帝的夢中與喇嘛的預言相一致。

這部六位哲布尊丹巴的合傳雖然極其簡短，卻提供了不少獨特的信息：一是將額駙的名字記為「策旺頓珠多吉」；二是增加了雍正帝夢中所見與西藏喇嘛的預言 / 神諭相符合的表述。

咸豐三年（1853），喀爾喀蒙古奏請將七世哲布尊丹巴呼畢勒罕從西藏迎回庫倫。³⁰ 與此同時，管理屬眾喇嘛的額爾德尼商卓特巴（erdeni šangjudba）衙門也完成新的歷代哲布尊丹巴傳記——【Y5】《敕封喀爾喀四部供養隆教安生哲布尊

²⁶ Okada Hidehiro, “Five tibeto-mongolian sources on the rje btsun dam pa qutuytus of urga,” 《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16 (1985) : 231。

²⁷ 實際上，包括納吉旺布此傳記在內的其他哲布尊丹巴傳記，一方面存在相似的記敘和表達，表明其因襲關係；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細節差異，透露出這些傳記在創作過程中資料來源的多樣，參見 Agata, *The Biography of the First Khalkha Jetsundampa Zanabazar by Zaya Pandita Luvsanprinlei*, pp. 47-53.

²⁸ Okada, “Five tibeto-mongolian sources on the rje btsun dam pa qutuytus of urga,” p. 232.

²⁹ ngag gi dbang po (Ngag dbang ye shes thub bstan), “skyabs mgon rje btsun dam pa rim po che'i sku phreng rim byon rnames kyi rnam thar mdo tsam du bkod pa pad dkar phreng mdos,” in *The Collected Biographies of Jebzundampa Khutugtus of Khalkha*, ed. R. Byambaa. Mongol bilig series for studying tibetan language works written by mongols (Ulaanbaatar: R. Byambaa, 2006), vol. 5, p. 736.

³⁰ 咸豐三年四月十一日德勒克多爾濟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錄副檔，檔號03-0206-4363-046。

丹巴呼圖克圖源流及其諸功績與眾恩典法令逐條繕寫之冊》(jarliγ-iyar qalq-a-yin dörben ayimay tur bügüdeger takiydaysan šasin-i manduyulqu amitan-i jirγayuluγči jibzundamba qutuγtu-yin uγ eki ba, eldeb γabiy-a jidkül olan jüil-ün kesig-i jüil darayalan bičigsen čese)。在二世哲布尊丹巴部分，除基本信息外，對靈童選定之經過及相關諭旨的記載更為豐富：

jibzundamba blama yin qubilyan i surbuljilan ereyülüre dalai blama bangčin (bančin) erdeni ner-tü tusqai jarliγ bayulγaju. basa dotuyadu örtege šangnaju. küriyen-ü mongol elči-ner-ün qamtu jürγan-u bošoy nige-yi γaryaju barayun joo yin yaγar-a ilegegsen. qoyina jibzundamba blama-yin qubilyan-i surbuljilan olugsan jerge yabudal-i ailadqaysan tur bayulγaysan jarliγ-un dotor-a ebügen jibzundamba blama irejü bi dörbedüger efü-yin ger-tür qubilba kemen ailadqaysan-i jegüdülegsen bülüge. qarin namayı jige köbegün-iyen jabsiytayulqu-yin tula blama bolyaba kemekü-yi boljoju bolqu ügei. minü jegüdün-tür ebügen qutuaytu bey-e-ber irejü nadur ailadqaysan bükün basači lama čoyijon dörbedüger efü yin köbgeünü ijayur öngdör (öndür) kemen jirγayasan anu neyilelčegsen-ü tulada. efü-yin köbgeün-i siregen-dür sayulγaytun kemegsen-i kičiyenggülen dayaγu qalqačud bügüdeger jalaju takıysan.³¹

[世宗皇帝]特命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尋訪哲布尊丹巴喇嘛之呼畢勒罕，並賞賜驛站，還派遣理藩院撥什庫一員與庫倫蒙古使者一同前往西藏。後上奏已尋得哲布尊丹巴喇嘛呼畢勒罕等情時，聖旨：[朕]夢見老哲布尊丹巴喇嘛前來奏稱其已轉生四額駙家中。將來或有人稱朕趁機約定朕之外甥為喇嘛者亦未可料。老呼圖克圖親來托夢所奏，與全體喇嘛吹忠所做四額駙之子家世高貴之指令相符。於是，眾喀爾喀恭請額駙之子坐床，敬謹供奉。

在這部又名《聖上源流》(degereki-yin uy eki orosibai) 的文獻中，雖然「班禪」bangčin、「溫都爾」öngdör 等詞的拼寫依然存留著編撰者的喀爾喀方言特徵；但內中尊稱清帝為「東方滿洲國大聖主」(jegün jüg-ün manju ulus-un yeke boyda ejen)，並詳載順、康以降諸帝廟號，處處可見清廷之影響，明顯具有商卓

³¹ 烏雲畢力格、散·楚侖，《蒙古國藏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蒙古文傳記彙集》，頁304-306。

特巴向清朝行政機構專門呈報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傳記的官方史書性質。該文本不僅增加了賞賜沿途驛站以便喀爾喀蒙古遣使入藏確認呼畢勒罕人選的記載，而且在所引諭旨中，雍正帝還強調最終選定額駙敦多布多爾濟之子為呼畢勒罕並非是要趁機給蒙古姻親謀取私利。相反，其合法性來自一世哲布尊丹巴在皇帝夢境中的「遺囑 / 預言」和西藏喇嘛的「神諭 / 認證」。至此，遺囑、神諭和夢境同時出現在關於二世哲布尊丹巴靈童選定的敘事中。

對這三個核心元素進一步增飾豐富的，就是前文提到的最常被人徵引的佚名所著【Y6】《哲布尊丹巴傳》。該傳記有多種抄本，後經蒙古學家鮑登轉寫譯註，成為蒙古學界十分基礎而重要的文獻。³² 關於二世哲布尊丹巴的靈童，傳記提到：

(一世哲布尊丹巴在北京)彌留之際，隨其同來的喀爾喀兩個王為首的同伴問道：「將轉世到何方？」……(一世哲布尊丹巴)說：「要留心猴年或雞年生的女子。」公主聞訊，將此告與額駙達爾罕親王。達爾罕親王奏報世祖皇帝（應是世宗——引按）後，從驛站返回家鄉，娶和托輝特部塔布囊台什猴年生的女兒為哈敦。……把四個幼童的名字記下來奔赴西藏，奏報眾博格達及法主，以確定誰為真正的轉世靈童。眾博格達及法主降旨：「達爾罕親王額駙之子世族高貴。」喀爾喀使者赴藏之際，雍正皇帝夢中見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一世求見，告之曰：「我已轉世，那第四位幼童，額駙妾之子即是。」爾後，雍正皇帝頒旨：「朕夢中見到老呼圖克圖，告朕其投胎為額駙之長子，那幼童當為呼圖克圖。與西方眾博格達及法主所說的四額駙之子世族高貴相符，理當由其坐床。」³³

岡田英弘據鮑登本《哲布尊丹巴傳》書末「今咸豐帝在位九年」云云，推測該書成於一八五九年。³⁴ 二木博史則對鮑登所用是否為原本提出質疑，特別是作為底本的抄本「U」與達什巴德拉哈 (Дашбадрах) 據以整理的《額爾德尼召及溫都爾格根傳》(Erdeni juu ba öndür gegen-ü namtar orosibai) 之間存在同源關係，而

³² Charles R. Bawden, *The Jebtsundamba Khutukhtus of Urga: text, translation and notes* (Wiesbaden: O. Harrassowitz, 1961).

³³ 無名氏，〈哲布尊丹巴傳〉，頁 235-236。據《蒙古國藏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蒙古文傳記彙集》共載 (olana ergügdegsen) 十年 (1921) 抄本 (頁 1191)，Bawden 將 yeke 「長 (子)」轉寫為 jige 「外甥」(p. 21)，疑誤。

³⁴ Okada, "Five tibeto-mongolian sources on the rje btsun dam pa quturytus of urga," p. 232.

後者關於三世哲布尊丹巴圓寂之前的內容則被認為或成立於十八世紀中後期。³⁵ 那麼，該傳記很可能也出現在四世哲布尊丹巴時代。正如二木氏對《哲布尊丹巴傳》不同抄本進行比較研究之後所指出的，自一世哲布尊丹巴部分以降，敘事風格逐漸轉為資料彙集，特別是從第四世哲布尊丹巴傳記開始，不斷擴充而又來源各異的材料使得諸抄本間互有詳略，且差異逐漸增大。³⁶ 事實上，《哲布尊丹巴傳》中關於二世哲布尊丹巴的部分，也經歷了陸續編纂的過程。

在此文本中，西藏喇嘛和吹忠給出的認證或神諭是「達爾罕 (darqan) 親王額駙之子世族高貴」，雖然不似理藩院據喀爾喀蒙古使者「齎回班陳、達賴喇嘛之文」而奏請「應將額駙敦多卜多爾濟之子，准為澤卜尊丹巴胡圖克圖之胡畢爾汗」那般言之鑿鑿，³⁷ 但「達爾罕親王額駙」所指應即敦多布多爾濟；再結合雍正帝對其夢境的描述及解釋來看，《哲布尊丹巴傳》與《聖上源流》的記載近乎一致，明顯存在同源關係。傳記還說：「額駙達爾罕親王夢中見其念珠的大珠及拇指上節化為金剛菩薩，其妻查干達拉夢中見溫都爾格根步入其庭院，後入室內。」³⁸ 這與前引納吉旺布《善緣信者之車》中對雍正帝夢境的記載十分接近，只是做夢者從雍正帝移植到敦多布多爾濟夫婦身上。

《哲布尊丹巴傳》相較於此前文本最大的不同是對「預言 / 遺囑」元素的擴充——格根臨終之際，曾預言將轉生於猴年或雞年出生的女子腹中。一方面我們可以將之看作是老呼圖克圖對自己轉世的提前安排，也即遺囑，以此建構哲布尊丹巴世系的神聖性與合法性；另一方面，此消息又引出額駙、公主與雍正帝的提前佈局，並返回蒙古迎娶猴年出生女子，似乎透露出有人為競爭操作的痕跡。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細節涉及對蒙古文《哲布尊丹巴傳》中“qoyar wang”的理解。鮑登英譯本與上引申曉亭、成崇德漢譯本將之理解為「兩個王」，即一世格根臨終時面對「以喀爾喀兩個王為首的侍從 (qalqa qoyar wang ekilen bar-a boluyči)」的詢問，作出的預言是「讓喀爾喀的兩個王留心猴年或雞年所生之女子

³⁵ Дашбадрах Доржготовын, “Өндөр гэгээний намтар оршвой,” in *Шагдарсүрэнгийн Сонинбаар, Доржготовын Дашибадрах, Өндөр Гэгээний намтрууд оришивой*, ed. Шагдарын Бира (Улаанбаатар: ШУА-ийн Эрдэм Компани, 1995), pp. 1-2.

³⁶ 二木博史，〈モンゴル語版『ジェブツンダンバ・ホトクト伝』について〉，《東京外国语大学論集》82 (2011) : 3, 9-12。

³⁷ 清理藩院，《乾隆朝內府抄本《理藩院則例》》，頁 119。

³⁸ 無名氏，〈哲布尊丹巴傳〉，頁 236。

(qalqa qoyar wang-i beči takiya jil-tü keükən-i asara)」。³⁹ 但似乎與所用屬格形式 (wang-i) 相矛盾。十九世紀末期俄國蒙古學家波茲德涅耶夫 (Позднеев) 所著《蒙古及蒙古人》(Монголия и монголы) 參考引述了不少歷輩哲布尊丹巴的傳記和傳說，其中二世活佛的部分即以《哲布尊丹巴傳》為主要來源。該書將 “qoyar wang” 理解為「第二王」(второй вань)，⁴⁰ 即專指達爾罕親王應娶猴年或雞年出生的女子為妾，這樣額駙與其所生之子便成為呼畢勒罕的唯一候選人。而且，波茲德涅耶夫進一步將敦多布多爾濟奏請返回蒙古一事解釋為是雍正帝敕許其「立即履行呼圖克圖的遺言」。⁴¹ 如此，清廷從一開始便參與到整件事情的謀劃之中。妙舟《蒙藏佛教史》很可能參考了《蒙古及蒙古人》的轉述，同樣譯為「第二王」。⁴² 而在《寶貝念珠》早期漢譯本《蒙古逸史》的按語中，原本發生在一世格根與左右侍從之間的對話進一步演變為「其姪惇多布多爾濟額駙密叩其來世降生所在」，旋即「奏明原委，乞假馳回外蒙」云云。⁴³ 如此，老呼圖克圖關於轉世的預言便只有額駙一人知曉，宮廷秘聞的氣息愈發濃重。如果將 “qoyar wang” 特指「第二王」，那麼無論當時在場者是一人或是多人，也無論雍正帝是否參與密謀，額駙親王返回喀爾喀再娶都只是在履行老呼圖克圖的遺囑罷了。波茲德涅耶夫在一八八三年完成的對《寶貝念珠》的俄文譯註中曾據此認為，轉世靈童的人選在格根生前便已經被與之關係密切的喀爾喀王公貴族和皇帝內定。⁴⁴ 然而實際情況或許要複雜激烈得多。事實上，波氏也注意到預言的模棱兩可與寬泛，所謂「內定」並非明確地指定，「因為凡是有猴年或雞年出生的妻妾的王公，都可以指望自己的兒子會被選為呼畢勒罕」，而且「當下無法明確未來孩子的任何特殊徵兆及其出生時間，因為敦多布多爾濟的那個妻子（妾，筆者按）有

³⁹ Bawden, *The Jebtsundamba Khutukhtus of Urga*, p. 20；烏雲畢力格、散·楚侖，《蒙古國藏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蒙古文傳記彙集》，頁 1188。

⁴⁰ А. М. Позднеев, *Монголия и монголы. Результаты поездки в Монголию, исполненной в 1892-1893 гг.*, Т. 1: Дневник и маршрут 1892 года (СПб.: изд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96), p. 507.

⁴¹ 阿·馬·波茲德涅耶夫著，劉漢明、張夢玲、盧龍譯，《蒙古及蒙古人》(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第 1 卷，頁 549。

⁴² 釋妙舟，《蒙藏佛教史》，頁 157。

⁴³ 黃成垿，《蒙古逸史》，頁 58。

⁴⁴ А. М. Позднеев,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Эрдений Эрихэ». Подлинный текст с переводом и пояснениями, заключающими в себе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Халхи с 1636 по 1736 г* (СПб.: Тип. Имп. акад. наук, 1883), p. 308.

可能第一次產下是女孩，第二次還可能是個女孩」。⁴⁵ 敦多布多爾濟固然可以格根預言的模糊性為藉口一直等到有男孩誕生，但這顯然難以說服其他貴族。在《哲布尊丹巴傳》的另一抄本中，當時陪侍一世哲布尊丹巴左右並聽聞轉世預言的是達爾罕親王 (darqan čin wang)、將軍諾顏 (jangčün noyan)、車臣汗 (sečin qan)、滿珠錫里喇嘛 (mančuširi) 四人。⁴⁶ 這似乎已經暗示了競爭的可能，有學者便認為「這四個喀爾喀僧俗有力人士必定也曾參與其事」。⁴⁷

波茲德涅耶夫首次去蒙古進行考察時 (1876-1878)，已經注意到在蒙古草原上流傳著當年喀爾喀貴族為了讓自己兒子成為二世哲布尊丹巴靈童而暗自籌劃並試圖得到西藏承認的說法。⁴⁸《蒙古及蒙古人》還記載：

到了今日，一些思想開通並且也不那麼狂熱的喇嘛直言無忌地談論著當時王公們怎樣勾心鬥角地想要使自己的兒子被選為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呼畢勒罕。據他們說，這些王公有車臣汗，三音諾顏的達親王，以及比什呼力圖貝子等，他們不惜遠赴西藏，運動達賴喇嘛宣佈他們各自的兒子為呼畢勒罕。這些傳說很可能事出有因，因為哲布尊丹巴在蒙古的地位對於任何一個人都確有著異常巨大的誘惑性。……在皇帝的決定尚未傳到喀爾喀時，那裡的權貴為了呼畢勒罕的擇定問題正在進行激烈的爭奪，這從文字記載中可以看到一些跡象。在《哲布尊丹巴格根誕生的歷史》中記載著這樣一件奇事：厄魯特部的達爾罕托音那木札勒當時住在達爾罕親王宮中，有一天他走進親王的帳幕對親王說，他聽說西藏的護法似乎已經宣佈哲布尊丹巴已在喀爾喀轉生，投胎為車臣汗的兒子。⁴⁹

這些傳言或傳記反映的正是靈童未定之際包括車臣汗部的車臣汗 (Цэцэнъ хана)、比什呼力圖貝子 (Биширэльтүү бэйсэ)⁵⁰ 以及賽音諾顏部的達親王 (Да

⁴⁵ Позднеев,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Эрденийн Эрихэ», pp. 308-310.

⁴⁶ Bawden, *The Jebtsundamba Khutukhtus of Urga*, p. 68. 鮑登並未提供這一抄本的具體信息，僅標註為丹麥皇家圖書館藏本，編號 Mong414。

⁴⁷ 札奇斯欽，《蒙古與西藏歷史關係之研究》，頁 636。

⁴⁸ Позднеев,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Эрденийн Эрихэ», p. 308. 波茲德涅耶夫在該頁注釋 2 中引述他三年前所寫 *Ургинскихъ хутухтыхъ* 中的內容，即 *Ургинские хутухты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их прошлого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быта* (СПб.: Тип. брат. Пантелеевых, 1880).

⁴⁹ 波茲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 1 卷，頁 550-551, 553。

⁵⁰ 比什呼力圖 (bisireltüü) 貝子旗應在車臣汗部，見 Позднеев, *Монголия и монголы*, T. 2: *Дневник и маршрут 1893 года* (СПб.: изд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98), p. 300.

цинъ вана) 在內的喀爾喀貴族間的暗自爭鬥，再加上土謝圖汗部的達爾罕親王，喀爾喀蒙古各大汗部幾乎都被捲入故事之中。賽音諾顏部在雍正九年才被從土謝圖汗部中分出，⁵¹ 傳言固然存在時間和稱謂上的錯亂，但所欲展現的則是喀爾喀各部圍繞轉世靈童人選的激烈競爭。而且，正是因為其內部的爭鬥不決，才更加需要雍正帝作出最終裁決，由此也反映清廷之於喀爾喀蒙古政教的推動作用。

抄寫於同治九年（1870）的【Y7】《第一世博格達哲布尊丹巴喇嘛名號及初建扎倉祈願佛教永駐》（boyda jibzundamba lama-yin angqan törül-ün ner-e orosiba. oron dačang angqan bayıyluysan buyan-iyar burqan-u sajin öni egüride orosiqu boltuyai）雖以一世哲布尊丹巴事蹟為主體，但對此後歷輩轉世亦有記載，應是自十八世紀中葉開始陸續編纂而成。相對於其他版本的《哲布尊丹巴傳》，該文獻不僅受佛教傳說影響較少，而且具有編年史書的性質。特別是關於庫倫各扎倉的建立，往往記錄確切之年代或其他細節信息。⁵² 這一特徵也表現在二世哲布尊丹巴的傳記中：

arban doluduyar türül ün ner-e jibjunlobsangdambidongmi nayiraltu töb ün qoyaduyar on köke γal luu jil qalq-a-yin qan ayula yin oyir-a ügemür kemekü γajar-a ulus un efü wang čewan[g] dongdobdorči yin ger tür eke qatun čayan dar-a bayartu ača qaburun dumdatu sara-yin Sine-yin nigen tü qubilyan γaraču mengdülegsen bui.⁵³

十七世名哲布尊羅布桑丹彬多密，雍正二年甲辰（木龍）在喀爾喀汗山附近的烏格木爾之地額駙王策旺敦多布多爾濟家中，二月初一日，從其母后察罕達拉巴雅爾圖那裡轉生。

這一相對簡略的記述並未涉及二世靈童選定之經過，但對其出生地點在汗山附近的烏格木爾的記載則更為具體，所記出生時間（雍正二年二月初一日）亦與《哲布尊丹巴傳》相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該傳記將四額駙的名字載為「策旺

⁵¹ 傅林祥等，《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清代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頁 651。

一說在雍正三年，見《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收入包文漢、奇·朝克圖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第 1 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8），卷六九，〈喀爾喀賽因諾顏部總傳〉，頁 474。

⁵² Н. Хатанбаатар, “Монголын Их хүрээ хийд: аймаг ба дацан” (https://www.academia.edu/30971383/Ilk_Khuree_khiid_aimag_ba_datsan_docx?auto=download).

⁵³ 烏雲畢力格、散·楚侖，《蒙古國藏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蒙古文傳記彙集》，頁 45。案，雍正甲辰為木龍年，原文作火龍年（γal luu jil），應誤。

敦多布多爾濟」，與納吉旺布《白蓮美鬘》一致。而且，關於一世哲布尊丹巴圓寂後雍正帝諭旨及賞賜之物的記載也與《善緣信者之車》十分接近，⁵⁴ 表明《第一世博格達哲布尊丹巴喇嘛名號及初建扎倉祈願佛教永駐》與納吉旺布所著傳記之間存在同源或沿襲關係。

根據撰述的立場和性質，上述七種文獻可以被分為兩類：一類是具備官方色彩的「史傳」（Y1、Y2、Y5、Y7），主要由哲布尊丹巴商卓特巴衙門等機構向清廷呈報備案，除記錄歷輩哲布尊丹巴源流及生平外，還存錄清廷冊封賞賜的印敕、諭旨、咨文等官方往來文書；一類是帶有宗教情感的「聖傳」（Y3、Y4、Y6），由蒙藏喇嘛完成，更多關注歷代哲布尊丹巴在宗教層面的言教和神蹟，因充滿神話色彩，情節也更為生動豐富。除了文獻本身的續纂屬性外，各文本間關於二世哲布尊丹巴個人信息及其選定過程的記載也存在一定的因襲和借鑒。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出現的傳記中，一世哲布尊丹巴托夢雍正帝、西藏喇嘛認證轉世靈童人選等情節，應受到納吉旺布所作藏文傳記《善緣信者之車》和《白蓮美鬘》（或者與之同源的更早傳記文本）的影響；而在此之前《溫都爾格根源流及彼時滿洲皇帝諭旨等重要事項彙寫冊》、《寶貝念珠》等官私「史傳」中對二世哲布尊丹巴生平的記載相對簡略，對其呼畢勒罕身分認定的經過著墨不多；相應的，有關二世哲布尊丹巴具體的出生地點、雍正帝賞賜沿途驛站之諭旨，則較先出現於《聖上源流》、《第一世博格達哲布尊丹巴喇嘛名號及初建扎倉祈願佛教永駐》一類官方文獻裡。

從總體上看，愈晚出的文本各種細節也愈豐富，尤以存在多種抄本的佚名《哲布尊丹巴傳》和波茲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當中的記載為集大成之代表。這些情節曲折豐富的傳記儘管在細節上有出入，但都包含有「（一世格根的）遺囑」、「（西藏喇嘛的）神諭」、「（雍正皇帝的）夢境」這三個核心要素。具體來說：一是老活佛曾在臨終前或通過身後托夢的方式對自己的轉世作出預言，並且有喀爾喀貴族參與其中或提前知曉而早作準備；二是按照當時格魯派活佛轉世制度，前往西藏請護法神對候選靈童作出認定，此過程中同樣存在喀爾喀各勢力間的明爭暗鬥和互不相讓；三是雍正帝依據自己的夢境對二世哲布尊丹巴人選作出最終裁定。

⁵⁴ 烏雲畢力格、散·楚侖，《蒙古國藏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蒙古文傳記彙集》，頁42-43。

三・相關檔案文獻的考察

傳記文本中圍繞二世哲布尊丹巴靈童選定被踵事增華的情節，相當程度上是為了構建活佛轉世的神聖性與合法性；草原上的種種傳聞自然也有好事者不斷添枝接葉。然而，傳記及傳言中關於喀爾喀蒙古各部貴族間的競爭、西藏喇嘛的認證、雍正帝據夢境而作出的最終裁定等內容，實則都存在歷史依據，並且可從兩份清代滿文檔案中找到更早的來源。

第一份是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喀爾喀副將軍、額駙策凌 (ts'ering) 奏摺：

喀爾喀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妹達錫吹木丕爾托音 (dasi coimpil toin) 遣人來臣處報稱：「我年紀已老，即在旦夕。請爾等會議，經具奏聖主，求驛 (giyamun baifi) 遣人往西土，將呼圖克圖降生於何處何地之事，給達賴喇嘛、班禪、拉穆吹忠等看視，使我老人死前聞之喜悅。」等語。臣語之言：「現既遣使送呼圖克圖之布彥 (buyan)，又何必另遣使臣。」等語。其後，達錫吹木丕爾托音遣王丹津多爾濟 (danjin dorji) 來報臣曰：「現土謝圖汗旺扎爾多爾濟 (tusiyetu han wangjal dorji) 生一子，王額駙敦多布多爾濟在此之房婢 (wang efu dongdob dorji i ubade bisire sula hehe) 生一子，貝勒車木楚克那木扎爾之子 (beile cemcuk namjal i jui) 生一子，達錫吹木丕爾托音之奶母之子車登 (dasi coimpil toin i meme i jui ceden) 生一子。據來報伊等生俱奇特。各已齋戒敬養。伊等皆為大者，今若不及早認定，則送呼圖克圖之布彥時，伊等之人皆去，恐有變故，是以趕緊派人赴西土看視。其送布彥之人等，欲今歲暫停。將此密告額駙 (narhūšame efu de ala)。」等語。是以我等與我喀爾喀汗等商議：「呼圖克圖乃我等供奉之喇嘛，若不訪認真呼畢勒罕，致起爭鬥，則不可矣。是故我喀爾喀汗旺扎爾多爾濟等以為此事，請派人往西土。」等因賚奏。將其中之緣由，臣乘便密奏以聞。⁵⁵

根據蒙古習俗，貴族婦女「素有參與部族事務的資格和權力，也受到族眾的尊重與奉隨」，這一傳統在蒙古被納入清朝盟旗制度後依然發揮作用，並「集中

⁵⁵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策凌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宮中滿文硃批奏摺，檔號 04-02-002-000133-0004。漢譯參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合肥：黃山書社，1998），下冊，頁 1364。

於決策族權爵位之承襲」。⁵⁶ 檔案中提到的「達錫吹木丕爾托音」，即前引《起居注冊》中與喀爾喀王一同遣使西藏的「達錫」。作為一世哲布尊丹巴和老子謝圖汗察琿多爾濟（čaun dorji）之妹，達錫吹木丕爾托音本就地位尊貴，特別是在爵位承襲或活佛轉世前後的空檔期，更扮演重要角色。因此由她出面致書駐防阿爾泰的副將軍策凌，請其與喀爾喀其他王公商議並奏報雍正帝後派遣使者經由驛站入藏，請西藏眾法主確認轉世靈童人選。按慣例，喀爾喀蒙古僧俗每年要往西藏向達賴、班禪等賚送修福之貢獻（布彥），故而策凌最初認為沒有必要專門另派使者，打算待今年以哲布尊丹巴名義入藏熬茶時一併處理。得知策凌態度之後，達錫吹木丕爾托音又派郡王丹津多爾濟前來催促。丹津多爾濟是察琿多爾濟之弟西第什哩的次子，雍正元年晉封多羅郡王；雍正二年任副將軍，與策凌、博貝分兵駐守阿爾泰；雍正四年「偕土謝圖汗旺扎勒多爾濟請助給屯田兵糧」。⁵⁷ 或因丹津多爾濟彼時身在土謝圖汗部，遂被姑母達錫吹木丕爾托音派去向策凌再次闡明利害：現有四名呼畢勒罕候選人，每位靈童又都代表著一股政治勢力，如果四方都以哲布尊丹巴名義派人入藏，顯然會引發變亂。於是決定今年暫停送布彥一次，同時需盡快專程赴藏確認呼畢勒罕人選。意識到事態緊迫的策凌旋即與喀爾喀汗王商議，由土謝圖汗旺扎爾多爾濟領銜奏請遣使入藏。

從雍正元年一世哲布尊丹巴圓寂到雍正五年清廷下旨冊封呼畢勒罕，其間相距近五年，《蒙古及蒙古人》和《蒙藏佛教史》認為前往西藏的使團至少在雍正三年便已回到喀爾喀，而直至雍正五年才正式冊封，是因為小哲布尊丹巴「那時不過一周歲半，因此皇帝的決定自然不能立即執行」，⁵⁸ 但從上引奏摺來看，喀爾喀對呼畢勒罕人選的尋覓和爭論在雍正四年時仍未結束，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策凌在奏摺中向皇帝匯報喀爾喀現有四名呼畢勒罕候選人，需派人入藏請喇嘛認定。這表明佚名所著《哲布尊丹巴傳》中所言「把四個幼童的名字記下來奔赴西藏，奏報眾博格達及法主，以確定誰為真正的轉世靈童」云云並非空穴來風。⁵⁹

⁵⁶ 參看賈寧，〈清代文獻所見之蒙古婦女地位〉，《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0（2017）：231-249；賈寧，〈滿文題本揭示的清代蒙古各部貴族女性對爵位承襲事務的參與：以青海蒙古為中心的對比和分析〉，達力扎布主編，《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8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5），頁83-95。

⁵⁷ 《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卷四九，〈札薩克多羅貝勒西第什哩列傳〉，頁353-354。

⁵⁸ 波茲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頁553；釋妙舟，《蒙藏佛教史》，頁159。

⁵⁹ 無名氏，〈哲布尊丹巴傳〉，頁236。

而且，前述鮑登和札奇斯欽皆曾寓目的《哲布尊丹巴傳》另一抄本同樣將角逐呼畢勒罕的勢力記為四方，⁶⁰ 很可能也源於歷史事實。

策凌的密摺還提供了十分關鍵的信息——當時所尋找到的四位靈童候選人分別是：土謝圖汗旺扎爾多爾濟之子、親王額駙敦多布多爾濟之子、貝勒車木楚克那木扎爾之孫、達錫吹木丕爾托音奶母之孫。這份被送往西藏的名單中並沒有出現如《蒙古及蒙古人》所載草原傳聞中提及的車臣汗部或賽音諾顏部的人選。⁶¹ 相反，四個候選人全部來自土謝圖汗部，甚至局限在土謝圖汗家族之內。旺扎爾多爾濟是察暉多爾濟之孫，多爾濟額爾德尼阿海之子，康、雍之際為土謝圖汗；敦多布多爾濟除是清廷額駙外，還是察暉多爾濟長孫，康熙朝曾短暫承襲土謝圖汗號；車木楚克那木扎爾則是察暉多爾濟從子；達錫吹木丕爾托音是察暉多爾濟之妹，其奶母自然也來自土謝圖汗部。⁶² 甚至就連間接參與此事的丹津多爾濟和策凌等人也同屬土謝圖汗部。如此來看，一世哲布尊丹巴臨終時的所謂預言或遺囑確實可被視為一種「內定」——令哲布尊丹巴繼續轉生於土謝圖汗家族之中，以此鞏固其在喀爾喀蒙古中的地位。此舉勢必引起其他汗部的不滿，也為後世渲染各勢力間的競爭激烈埋下伏筆。

奏摺中另一與傳記有關的信息是喀爾喀使者入藏需藉助清朝的驛站和驛道系統，故達錫吹木丕爾托音要向清朝皇帝「求驛」。雖然現存檔案未見雍正帝關於此事的直接批覆，但《聖上源流》等「史傳」中皆保存了皇帝「賞賜驛站」(dotuyadu örtege šangnaju) 的諭旨。而《哲布尊丹巴傳》等「聖傳」則記載額駙敦多布多爾濟聽聞格根遺囑並向皇帝奏報後，奉旨「立即從驛站返回家鄉」(örtegeber darui nutuy-tu bučaju)。⁶³ 傳記文本專門言及驛站和諭旨這一細節，很可能即來源於當時的官方檔案。對交通資源的掌控，表明清廷在介入蒙藏關係時處於一定的優勢和主導地位。雍正帝於硃批中說：「聞爾等之力亦稍不足」(donjici

⁶⁰ Bawden, *The Jebtsundamba Khutukhtus of Urga*, p. 68；札奇斯欽，《蒙古與西藏歷史關係之研究》，頁 636。

⁶¹ 波茲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 1 卷，頁 551。

⁶² 世系參看《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卷四八，〈追封多羅郡王札薩克多羅貝勒車木楚克納木札勒列傳〉，頁 349-350；齊光，《大清帝國時期蒙古的政治與社會：以阿拉善和碩特部研究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頁 350。

⁶³ Bawden, *The Jebtsundamba Khutukhtus of Urga*, p. 20.

suweni hūsun inu majige eleburakū sembi)，⁶⁴ 也透露出一種「自信」心態；這種主導性在此事的後續發展中表現更為明顯和直截。

第二份是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策凌奏摺，略云：

於去歲，臣我得悉達錫吹木丕爾托音、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在三、四處，日後發生爭執亦難預料，謹奏聖主往西地派使尋找等情，經臣謹具奏聞。本年，為呼圖克圖呼畢勒罕赴西地往尋之使臣、額駙敦多布多爾濟之弟貢扎布多爾濟 (gungjab dorji) 等返回，攜回喇嘛吹忠之文內稱：「額駙敦多布多爾濟之子即是 (efu dondob dorji i jui inu)」。等語前來。聞得，此次前去之使臣等抵達前，土伯特之人曾傳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降生在四額駙家中 (jebdzundamba kūtuktu i kūbilgan be duici efu i boode banjiha)」。等語。對此因我喀爾喀眾扎薩克等不服，雖傳喚當面開閱西域帶回之文，但僅來土謝圖汗、車臣汗 (cecen han) 幾名扎薩克，其餘扎薩克等並未前來。……今新轉生之呼畢勒罕，眾人生疑，且各存立己子為呼畢勒罕之心，則我喀爾喀等難辦，且使聖主之耳根發熱。依臣愚見，此事擴大之前，或將現所指新呼畢勒罕當即坐呼圖克圖之床；或查明真偽等情，若降旨今赴京城之王丹津多爾濟等，呼圖克圖屬眾等不致散去，經法 (ging ni doro) 不致混亂，且我喀爾喀等永享聖主之恩。⁶⁵

根據策凌奏摺，雖然蒙古使者帶回了西藏眾法主明確認定額駙敦多布多爾濟之子為呼畢勒罕的文書，但是該結論卻未能得到全體喀爾喀的信服。一方面是由於候選名單已經存在排他性，使土謝圖汗部以外的各部從一開始就失去了競爭的機會；另一方面則因為所派使臣即為額駙之弟貢扎布多爾濟，而且在他抵達前，西藏就已開始傳揚哲布尊丹巴將轉世四額駙家中，難以擺脫暗中運作之嫌。因此，當喀爾喀召開部族會議試圖通過展閱西藏認證文書來消弭質疑時，只有土謝圖汗和車臣汗部的幾名扎薩克前來，其餘各部貴族直接以缺席表達不滿，甚至存在另立新活佛的想法。這一矛盾便為此後傳記和傳說中喀爾喀各部圍繞靈童人選明爭暗鬥情節的出現提供了創作空間。而且，在傳聞中參與競爭的車臣汗、賽音

⁶⁴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策凌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宮中滿文硃批奏摺，檔號 04-02-002-000133-0004。

⁶⁵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策凌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宮中滿文硃批奏摺，檔號 04-02-002-000143-0015。漢譯參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 1552。

楊奇霖

諾顏親王等角色的出現，似乎也有歷史的痕跡。除在傳記裡時常出場的車臣汗繼續在檔案中被提及外，這兩份密摺的具奏人策凌在雍正九年因軍功晉封親王，並授「喀爾喀大扎薩克」，統領從土謝圖汗部被劃分出的賽音諾顏部。⁶⁶ 那麼，《蒙古及蒙古人》所載「三音諾顏的達親王」的歷史原型或許正是這位真正的賽音諾顏和碩親王。不同的是，策凌在此事中非但沒有參與喀爾喀的內部爭鬥，而是以清朝「副將軍」和「額駙」的身分向皇帝密奏並出謀劃策。

雍正五年六、七月間，策凌與四格、圖理琛等赴布爾河與俄羅斯使節勘定疆界並簽訂《布連斯奇界約》，⁶⁷ 因此，他在奏摺中說在蒙古使者返回時，自己「因在卡倫，未能與我喀爾喀汗、王、眾扎薩克等會面，未聞爾等有何言談」。⁶⁸ 而當他從屬下處聽聞轉世靈童的真偽正在造成喀爾喀各部間的分歧時，擔心如果新的哲布尊丹巴活佛遲遲未能坐床很可能導致屬眾的混亂。於是在喀爾喀蒙古已派出丹津多爾濟入京匯報的同時，策凌也密奏皇帝建議其早作決斷，確認呼畢勒罕身分。由此，皇帝的態度和最終裁定變得至關重要。清廷在哲布尊丹巴轉世中的作用，已不止於賞賜驛站遣使入藏，也不僅限於最後形式上給予冊封，而是扮演了「終審者」的角色。

結合前引《起居注冊》中理藩院於雍正五年十一月十八日「遵旨議奏」的時間和表述，在策凌奏摺發出前的一個多月，雍正帝已經從來京的丹津多爾濟（或其他管道）處獲悉了西藏認證文書的內容，甚至對喀爾喀各部間的紛爭亦有了了解，因此才會令理藩院議後具奏。理藩院建議「應如所請，將額駙敦多卜多爾濟之子封為澤卜尊丹巴胡圖克圖胡畢爾汗」，⁶⁹ 即認可西藏喇嘛的意見，接受哲布尊丹巴繼續轉生在土謝圖汗部。雍正帝在「召入王大臣等」商議時雖表示「應封於庫倫地方以掌黃教」，但仍要求「議政王大臣、九卿會同詳議」再奏。⁷⁰ 表明具體方案尚待商定，雍正帝還需與議政王大臣等進行溝通。《起居注冊》這條記載並非正式冊封諭旨，也未明言承認敦多布多爾濟之子即是哲布尊丹巴呼畢勒罕。然而從清廷已經開始討論冊封細節來看，顯然皇帝同意了理藩院的建議，又或者理藩院議奏的方案本就是皇帝意志的體現。雍正帝收到策凌奏摺後，硃批

⁶⁶ 《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卷七〇，〈扎薩克和碩超勇襄親王策凌列傳〉，頁 482。

⁶⁷ 《世宗憲皇帝實錄》卷六〇，雍正五年八月乙巳（二十二日），頁 921。

⁶⁸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策凌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宮中滿文硃批奏摺，檔號 04-02-002-000143-0015。

⁶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起居注冊》，頁 1588。

⁷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起居注冊》，頁 1589-1590。

道：「爾此奏送抵前，已降旨定奪。朕之所夢 (mini tolgikan bade)：必由王丹津多爾濟來告。大奇 (ambula ferguwcuke)！」⁷¹ 這表明，在雍正五年十一、十二月間，雍正帝經過與其他決策參與者商議，對二世哲布尊丹巴呼畢勒罕人選與冊封事宜作出了最終裁定。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帝硃批提到曾在夢中預見該消息必定由丹津多爾濟前來奏報，並感慨此事奇妙。雍正帝是否還夢到了一世哲布尊丹巴的囑託，甚至他是否真的有此一夢，已難探求。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作為哲布尊丹巴轉世敘事的重要元素，皇帝的「夢」在當時的官方檔案裡明確出現。此後各傳記中關於皇帝夢境同西藏神諭「相符合」的情節，也與檔案中雍正帝所夢果真應驗的記載存在密切關聯。

這說明，陸續寫定於十九世紀中後期的二世哲布尊丹巴傳記，除了彼此借鑒和因襲外，還保留了十八世紀初歷史現場的痕跡。經由傳記流傳，文本背後潛藏的清廷與喀爾喀的權力關係也逐漸進入蒙古人的文化記憶或身分認同之中。對喀爾喀蒙古來說，清廷的冊封為這場紛爭一錘定音。波茲德涅耶夫記述哲布尊丹巴的某傳記抄本稱：「後來達爾罕親王常常提起這件事，他說有人指責他千方百計要使幼子當呼畢勒罕，其目的就是想使長子沾光。現在皇上做了這樣一個夢，他的罪名才洗清了。」⁷² 在此敘事中，雍正帝的夢境將喀爾喀呼畢勒罕的合法性與大清皇帝的權威聯繫起來，清廷對蒙古佛教的影響與干預大有超越西藏的意味。除前述《聖上源流》中尊稱清帝為「東方滿洲國大聖主」的「顯性」例子外，在《哲布尊丹巴傳》的一個重要抄本中，「觀音」一詞並未像其他文本那樣寫成音譯自藏語 “sPyan ras gzigs” 的 “jayirayisig”，而是受到漢語影響寫作 “qongsim bodisadua”。⁷³ 此類細微話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滲入文本的權力走向。正如柯嬌燕 (Pamela Crossley) 描述乾隆朝通過歷史敘事來施加政治與意識形態影響時所說：清朝藉助佛教修辭 (Buddhist rhetoric) 和那些接受清廷贊助且精熟藏語的蒙古喇嘛們，以朝廷認可的蒙古作品來為蒙古設定了單一的文化、語言和宗教，並最終實現對蒙古的統治。⁷⁴

⁷¹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策凌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宮中滿文硃批奏摺，檔號 04-02-002-000143-0015。

⁷² 波茲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 1 卷，頁 553。

⁷³ Bawden, *The Jebtsundamba Khutukhtus of Urga*, p. 70.

⁷⁴ Pamela Kyle Crossley, “Review of *Our Great Qing: The Mongols, Buddhism, and the St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y Johan Elverskog,” *History of Religions* 49.1 (2009): 98.

雖然在後文我們將繼續討論大清將喀爾喀政教事務納入新的權力關係，但藏傳佛教傳統王權觀在雍正時期乃至更晚近依然具有解釋力。即便是站在清廷的立場上，《聖上源流》所載雍正帝在諭旨中為自己辯解並非是要「趁機約定朕之外甥為呼圖克圖」，而是老格根夢中的指示，實則將清廷冊封的合法性又追溯回佛教領袖，旨在為其政治權威賦予神聖性。在哲布尊丹巴轉世故事通過文本或傳說流傳的同時，西藏要素及其所代表的佛教權威還以圖像形式出現在蒙古繪畫藝術中。藝術史學者 Elisabeth Haderer 的一項研究討論了兩幅大約創作於十九世紀的以二世哲布尊丹巴為主尊的唐卡，其中便有關於選認呼畢勒罕的情節（圖一、圖二）。以圖一為例，場景下方身著黃色服飾者手持標寫有疑似藏文“ka”的文書，身旁是一位藍色裝束者。Haderer 認為左側人物是大清皇帝的使者，正在將西藏達賴、班禪的認定文書交給右側的敦多布多爾濟。⁷⁵ 當然，我們還可以作出其他解讀——左側身穿披單、僧侶打扮者是西藏喇嘛的代表；而右側明顯清朝頂戴者更可能是雍正帝的使者或理藩院官員。而且，在十九世紀以來的蒙古繪畫中，黃色服飾往往意味著佛教權威，藍色著裝則象徵世俗權力。⁷⁶ 在描繪活佛轉世認定的場景中，黃色（神聖權力）與藍色（世俗權力）並立；而標有藏文字母的梵夾更成為二人傳遞的核心，似乎都表明在蒙古人觀念裡西藏的宗教權威始終存在。

四・雍正帝對人選的考量

雖然在策凌第二份奏摺送達北京前清廷已經作出了裁決，但從雍正帝與議政王大臣不斷商議的記載來看，清廷當時所面臨的選擇正如策凌的建議：「或將現

⁷⁵ Elisabeth Haderer,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rJe btsun dam pa Khutukhtus in Mongolian Buddhist Art,” in *The Arts of Tibetan Painting: Recent Research on Manuscripts, Murals and Thangkas of Tibet, the Himalayas and Mongolia (11th-19th century)*, ed. Amy Heller (2012). <https://www.asianart.com/articles/haderer/index.html>. 本文圖一、圖二分別對應原文中的 Fig. 11a 和 Fig. 12a，其中收藏於烏蘭巴托 Fine Arts 博物館的 Fig. 11 創作年分不明，而著錄於 Г. М. Бонгард-Левина 所編 *Иконография Ваджраяны* (Москва: Дизайн. Информация. Картография, 2003) 一書的 Fig. 12 則標註為十九世紀所作 (p. 83, fig. 63)。兩幅唐卡雖然繪畫風格不同，但一致的構圖表明，相似內容的二世哲布尊丹巴唐卡在其傳記寫定的同時期已經出現。

⁷⁶ Tsultemin, *A Monastery on the Move*, p. 211.

所指新呼畢勒罕當即坐呼圖克圖之床；或查明真偽等情。」最終雍正帝沒有挑戰西藏在活佛轉世認定上的宗教權威，而是接受並支持了拉穆吹忠給出的認證結果。同樣，面對喀爾喀諸多扎薩克的不滿和質疑，雍正帝也沒有打破由土謝圖汗部所主導的既定人選框架，從車臣汗部或扎薩克圖汗部中另尋呼畢勒罕，等於承認並背書了哲布尊丹巴繼續轉生於土謝圖汗部的事實。

有學者認為，在一七九二年即清廷設計實施金瓶掣簽制度之前，大清皇帝並未將西藏神諭的權威、格魯派的占卜術與大清在外藩的主權明確地聯繫起來，因此尚無意打壓神諭傳統在蒙藏活佛轉世問題上的權威。⁷⁷ 該論點對年代更早的雍正朝同樣適用，顯然，此時清廷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仲裁蒙古對西藏神諭的懷疑和喀爾喀內部的紛爭，而不是明確挑戰西藏佛教。但是，這絕不表示雍正帝將「浪費」這難得的機會來展現並推進大清在蒙藏政教事務上的影響力。正如前文所述，雍正帝的夢所代表的清帝權威，已經與西藏神諭和老格根遺囑這兩個神聖元素並列，成為彼此佐證的轉世靈童合法性來源，甚至具有終審裁決的地位。如果說傳記文本所體現的大清「帝權」染指蒙藏「教權」是一種基於結果的歷史書寫與後見之明，那麼，雍正帝藉由哲布尊丹巴轉世靈童人選紛爭最終強化對喀爾喀蒙古的統治，或有更加明確的線索。

在歸附清朝之前，一世哲布尊丹巴曾與其兄察輝多爾濟分掌土謝圖汗部政教大權，隨著哲布尊丹巴逐漸成為喀爾喀左翼地區的黃教最高領袖，其政教影響力也開始不斷擴大。如前所述，無論老格根生前是否真的對自己的轉世做出過安排，從此後被送往西藏的靈童名單來看，土謝圖汗部的貴族顯然是希望哲布尊丹巴能繼續轉生於本部，並且已然付諸實際行動。對於清朝來說，一方面土謝圖汗部在喀爾喀蒙古中實力最強，「為喀爾喀四部之首，內則哲布尊丹巴住錫庫倫，外則鄰接俄羅斯，有恰克圖互市，形勢特重，號稱雄據」。⁷⁸ 清廷需要藉助其力量實現對喀爾喀的有效管理，特別是當時清帝國正面臨準噶爾的巨大威脅，亟需喀爾喀作為藩屏。另一方面，自一世哲布尊丹巴率部歸附大清以來始終與清廷保持著積極穩定的關係，成為喀爾喀蒙古中同清廷往來最為密切的汗部。因此，雍正帝確認新選出的呼畢勒罕並准其坐床之舉，是對土謝圖汗部地位的承認。

⁷⁷ Max Oidtmann, *Forging the Golden Urn: The Qing Empire and the Politics of Reincarnation in Tibe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53-94, 195.

⁷⁸ 《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五二一，〈藩部四〉，頁 14401。

不同於檔案裡達賴、班禪明確認定敦多布多爾濟之子為呼畢勒罕，傳記文本中西藏眾法主給出的略帶模糊的結論是「額駙親王之子世族高貴」。而四位候選靈童不僅全部來自土謝圖汗部，其中至少三位都是土謝圖汗袞布 (gümbü)、察輝多爾濟家族後裔。若論世族高貴，敦多布多爾濟和旺扎爾多爾濟同為察輝多爾濟之孫，並且旺扎爾多爾濟還是在任的土謝圖汗，身分更為尊貴。那麼，雍正帝何以最後認定了額駙敦多布多爾濟之子作為哲布尊丹巴呼畢勒罕？背後的考量或與敦多布多爾濟個人以及當時滿蒙之間的政治角力有關。

其一，是敦多布多爾濟與滿洲皇室的聯姻關係。敦多布多爾濟於康熙三十六年 (1697) 尚康熙帝第六女恪靖公主，授和碩額駙，康熙三十九年晉封和碩親王。⁷⁹ 因恪靖公主在得到封號的公主中排行第四，又稱四公主。⁸⁰ 故而前述傳記及檔案稱敦多布多爾濟為「親王」及「四額駙」。有記載稱其「幼育於北京之後宮」。⁸¹ 不過據敦多布多爾濟自述，康熙三十一年 (1692) 十六歲的敦多布多爾濟承襲多羅郡王爵是其「仰承聖恩」之始，亦是留給康熙帝的初次印象，直到五年後迎娶公主方才來京。⁸² 顯然，自幼長於宮中也是後世為突出其與清廷之親密而附會出的傳說。敦多布多爾濟既擁有土謝圖汗家族血脈，又與愛新覺羅氏沾親，由其子嗣成為新的哲布尊丹巴，顯然對滿蒙雙方都頗為合適。已有學者指出，敦多布多爾濟之子最終被認定為哲布尊丹巴的轉世靈童，是因其「與清廷關係甚密，尤得雍正的信賴，因此，使其子繼任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既便於貫徹清帝的旨意，又達到了支配和控制喇嘛教的目的，這樣，清帝便居於喇嘛教的宗主地位」，而這背後完全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⁸³

其二，敦多布多爾濟能力平庸。作為土謝圖汗察輝多爾濟的長孫，敦多布多爾濟本於康熙三十九年承襲汗號，然而僅兩年後便因「庸劣」被革退，從此汗位即由其親叔額爾德尼阿海一支承襲。⁸⁴ 而且，敦多布多爾濟的能力在雍正帝心中似乎也不高。雍正十年正月，喀爾喀副將軍丹津多爾濟上呈兩份奏摺，一為奏請

⁷⁹ 《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卷四七，〈扎薩克多羅郡王噶勒丹多爾濟列傳〉，頁 346。

⁸⁰ 杜家驥，《清朝滿蒙聯姻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3），上冊，頁 148-150。

⁸¹ 釋妙舟，《蒙藏佛教史》，頁 158；波茲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 1 卷，頁 551。

⁸² 郭美蘭，〈恪靖公主遠嫁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部述略〉，氏著，《明清檔案與史地探微》（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2），頁 214-215。

⁸³ 趙相璧，〈簡論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頁 374。

⁸⁴ 《聖祖仁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卷二〇八，康熙四十一年閏六月己酉（二十九日），頁 120。

將二世哲布尊丹巴之生母一併移居至多倫諾爾安住（此事詳下文）。事實上雍正帝對此已有所交代，然而哲布尊丹巴之父敦多布多爾濟似乎未能及時辦理妥當，引來雍正帝一頓牢騷：「四額駙乃無關緊要之人（oyombure niyalma waka），且其病癒後又復發，稍愈亦不可靠（akdaci ojorakū）。」⁸⁵ 所謂「不可靠」，既指敦多布多爾濟「素有足疾」，⁸⁶ 身體上難堪重任，同時也是就其辦事能力而言。另一摺為奏請將敦多布多爾濟派往軍中效力事，內中稱：「倘遣往軍中，則更於事有益」云云，雍正帝卻於此處旁批道：「大笑覽之（ambarame injeme tuwaha）」，又在奏摺最末硃批「無用（baitakū）」一語。⁸⁷ 可見雍正帝對敦多布多爾濟能力的不屑與不認可，甚至目為無用之人。或許雍正帝正是看中敦多布多爾濟並無雄才大略，不太可能利用二世哲布尊丹巴的宗教影響來與清廷抗衡。

其三，是利用敦多布多爾濟牽制旺扎爾多爾濟，以此限制土謝圖汗家族勢力。由於一世哲布尊丹巴同土謝圖汗之間的淵源，其屬眾最初都附牧於土謝圖汗部，並由土謝圖汗家族控制。康熙三十年（1691）清朝在喀爾喀推行盟旗制度，土謝圖汗雖不能再直接干預各扎薩克旗事務，但土謝圖汗家族仍是名義上的首領和宗主，有權管理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庫倫和沙畢，並得到清廷的承認。⁸⁸ 自雍正帝繼位以來，清廷開始採取各種措施削弱土謝圖汗的勢力。如前述從土謝圖汗部劃出十九旗，「別為一部，以其賽因諾顏號冠之，稱喀爾喀中路，不復隸土謝圖汗」，⁸⁹ 晉封額駙策凌為喀爾喀大扎薩克。至雍正十一年策凌署定邊左將軍印，⁹⁰ 喀爾喀的軍事、行政中心逐漸移至烏里雅蘇台。⁹¹ 佛教事務方面，雍正帝在繼位之初便利用一世哲布尊丹巴圓寂之機，命喀爾喀會盟推舉商卓特巴和堪布諾門罕，分別管理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庫倫的僧眾財產與誦經等事。經眾扎薩克

⁸⁵ 雍正十年正月十九日丹津多爾濟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宮中滿文硃批奏摺，檔號04-02-002-000166-0006。

⁸⁶ 《高宗純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卷一二六，乾隆五年九月乙亥（初七日），頁844。

⁸⁷ 雍正十年正月十九日丹津多爾濟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宮中滿文硃批奏摺，檔號04-02-002-000166-0007。

⁸⁸ 達力扎布，《喀爾喀法規漢譯及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5），頁19-22。

⁸⁹ 《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卷六九，〈喀爾喀賽因諾顏部總傳〉，頁474。

⁹⁰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六日策凌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223。

⁹¹ 達力扎布，《喀爾喀法規漢譯及研究》，頁24。

商議，由清廷議准，任命前任土謝圖汗額爾德尼阿海之子、現任土謝圖汗胞弟多爾濟完楚克托音為「掌管澤卜尊丹巴胡圖克圖徒衆辦理庫倫事務額爾德尼商卓忒巴」；原堪布諾門罕為班禪之徒，令其繼續「掌管澤卜尊丹巴胡圖克圖經壇，總理番僧事務」，並正式給以堪布諾門罕之號。⁹² 清廷對此二人「均與敕印」，意在增強哲布尊丹巴商卓特巴與庫倫堪布諾門罕的獨立性，削弱土謝圖汗家族的控制。多爾濟完楚克托音上任哲布尊丹巴商卓特巴後，「希圖霸佔呼圖克圖財產，交結奸宄，耗盡商上財富」。⁹³ 又把持庫倫事務，「大有總覽一切，統馭各屬之勢」，諸言行更引起庫倫徒眾強烈不滿，數千喇嘛一時群情激憤。⁹⁴ 經喀爾喀王公及各扎薩克商議，決定將多爾濟完楚克托音逐出庫倫，派人看守。此事雖與其兄土謝圖汗旺扎爾多爾濟無關，但其中透露出的潛在危險不得不令雍正帝警覺。在此背景下，四位靈童中最為「世族高貴」的土謝圖汗旺扎爾多爾濟之子反而有可能是雍正帝最不希望成為呼畢勒罕的人選。因為這樣便又會出現父子或兄弟二人分別為大汗和活佛，由此掌管政教事務，甚至是土謝圖汗、哲布尊丹巴、商卓特巴全部出自同一家族的同一支脈的局面。

如此看來，出身土謝圖汗家族卻被褫奪了汗號、地位顯貴卻無甚野心與能力的敦多布多爾濟便成為雍正帝藉以牽制土謝圖汗旺扎爾多爾濟的力量。而且，二人之間很可能還因部族利益存在嫌隙。雍正三年，土謝圖汗旺扎爾多爾濟通過額駙策凌向清廷狀告敦多布多爾濟佔據其兵丁不歸：

我祖土謝圖汗來投聖祖皇帝後，奉旨：「爾為老人，仍照常理守九煙閒居。將從爾之諸子內擢為扎薩克，其部下人等編為佐領。」欽此。奉命以其子噶爾丹為扎薩克王。扎薩克王噶爾丹故後，以其子敦多布多爾濟襲扎薩克王，故我所屬一佐領，現在額駙敦多布多爾濟旗內。聖祖皇帝賜我號瓦赤喇巴圖土謝圖汗，賞給印信。將此一佐領事報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祖知悉後，謂額駙敦多布多爾濟言：「將其所屬之佐領提升為旺扎爾多爾濟旗中」。等語。敦多布多爾濟言，經具奏後，提拔我佐領。⁹⁵

⁹²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眾佛保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上冊，頁128-130；清理藩院，《乾隆朝內府抄本《理藩院則例》》，頁118-119。

⁹³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策旺扎布等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上冊，頁126。

⁹⁴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眾佛保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上冊，頁130-132。

⁹⁵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十日策凌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1429-1430。

敦多布多爾濟於康熙朝短暫承襲土謝圖汗號及扎薩克王時，曾領有旺扎爾多爾濟部下一佐領。在其被革退後，一世哲布尊丹巴要求敦多布多爾濟將此一佐領歸還給新任土謝圖汗。敦多布多爾濟雖答應待將此事奏聞清廷後便行歸還，然而他卻遲遲沒有具奏，全無歸還之意。旺扎爾多爾濟又將此事說與策凌等人。策凌等對此亦有所聞，認為「此眾所周知……事甚明白……今若不弄清，則後日傳至子孫，將難以弄清」，遂與丹津多爾濟等人商議後於同年八月具奏：

將在額駙敦多布多爾濟旗內之汗旺扎爾多爾濟所屬一佐領，提升為汗旺扎爾多爾濟旗內，凡遇官事兵備，仍照一佐領當差行走。凡有驗丁行走等事項，准用瓦赤喇巴圖土謝圖汗印信。將有在額駙敦多布多爾濟旗之瓦赤喇巴圖土謝圖汗一佐領，歸隸汗旺扎爾多爾濟旗，其餘四佐領，仍留額駙敦多布多爾濟旗內可也。⁹⁶

然而此摺交由振武將軍穆克登送往北京後，便再無回音。於是策凌在雍正四年又由將軍處行文兵部查之，得到兵部咨覆稱：「喀爾喀副將軍等奏摺一到，即交付侍衛那蘭具奏，僅出發單，摺子留中。為此事，前往理藩院查之，亦云並無交付之處。」⁹⁷ 此後眾扎薩克便不敢再奏，也不敢詢問為何積壓。那麼，雍正帝為何要將此摺留中，為何沒給理藩院和兵部任何旨意，便頗值得玩味。似乎是雍正帝有意偏袒額駙，以模糊的態度將此事拖延至後世子孫難以弄清的地步；在這種偏袒的背後更可能是雍正帝試圖利用土謝圖汗家族內部的矛盾使其彼此牽制的政治考量。

五・雍正帝對佛教的利用與互動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理藩院遵旨議奏：「將額駙敦多卜多爾濟之子封為澤卜尊丹巴胡圖克圖胡畢爾汗」，王大臣等旋奉諭旨：

夫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與班禪、達賴喇嘛等之後身出世甚確，應封於庫倫地方，以掌黃教。朕為普天維持宣揚教化之宗主，而黃教者又無分於內外東西，隨處皆可播宣。昔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得尼在西域時，青海之額璽

⁹⁶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十日策凌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1430。

⁹⁷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十日策凌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1430。

汗、厄魯特等實與之鄰近，相為護持，故其教盛行於西藏。自此眾部落各為檀越主人，踵而行之，已積年矣。是黃教之所以興，但得有名大喇嘛出世，即可以宣揚，豈必僅在西域一方耶？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其鍾靈原有根源，乃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得尼相等之大喇嘛也，故眾喀爾喀俱尊敬供奉之。且伊所居庫倫地方，弟子甚眾。著動用帑銀十萬兩，修建大剎封伊後身，俾令住持，齊集眾喇嘛，亦如西域講習經典，宣揚釋教。……朕如此推廣黃教，建造寺宇，一如西域，令喇嘛居住，講習經典，則于伊等蒙古之誦經行善甚屬便易。蓋禮佛行善，無分遠近，闡揚黃教之處愈多，則佛法日益廣矣。朕非棄西域之教而別起事端。即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張家胡土克圖，皆前世達賴喇嘛之弟子，伊等豈肯忘其宗派耶。⁹⁸

這份諭旨的重點並不在確定二世哲布尊丹巴呼畢勒罕人選，甚至沒有明確提及額駙之子。如前所論，這一看似「跑題」的諭旨反而可以說明雍正帝已接受理藩院的方案，決定冊封敦多布多爾濟之子羅布桑丹彬多密為哲布尊丹巴呼畢勒罕。彼時他更為關心的是冊封（或曰尊奉）哲布尊丹巴可能造成對蒙藏既定政教關係的衝擊。因此，在諭旨中雍正帝追溯「根源」，明確指出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是「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得尼相等之大喇嘛」，確立其藏傳佛教格魯派四大活佛體系之一的地位。一方面強調，黃教之興「得有名大喇嘛出世，即可以宣揚，豈必僅在西域一方」，藉助即將由清朝支持而坐床的二世哲布尊丹巴的宗教影響力，試圖消解西藏達賴喇嘛的絕對權威，欲在喀爾喀蒙古樹立一個足以與之相抗衡且為清帝國所掌控的宗教領袖。另一方面，為免各方猜疑生變，又一再表示清廷此舉「非棄西域之教而別起事端」，且哲布尊丹巴亦「豈肯忘其宗派」。

清廷對二世哲布尊丹巴宗教權威的尊崇和支持，與當時的邊疆政局緊密相連。雍正五年，本已在康熙後期被基本納入清朝統治的藏地再起波瀾，前藏貴族阿爾布巴等人謀殺後藏政治首腦康濟鼐，引發西藏動亂，並有投靠準噶爾以抗拒清廷之嫌疑。⁹⁹ 此時清廷在藏地駐兵無多，但準噶爾卻已進入全盛期，對西藏和喀爾喀等地虎視眈眈。¹⁰⁰ 雍正帝在籌備入藏安撫並對準噶爾用兵的同時，還需

⁹⁸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庚午諭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起居注冊》，頁 1588-1590。

⁹⁹ 杜齊著，李有義、鄧銳齡譯，《西藏中世紀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室民族學室，1980），頁 146。

¹⁰⁰ 伊·亞·茲拉特金著，馬曼麗譯，《準噶爾汗國史（修訂版）》（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3），頁 319。

預防失去對西藏教權的控制之後喀爾喀的非分之想。因此，清廷再次提高哲布尊丹巴之地位，以此左右喀爾喀的政治態度，減弱西藏宗教對蒙古的影響。雍正帝在二世哲布尊丹巴呼畢勒罕選定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以及背後可能隱藏著與土謝圖汗部貴族所達成的某種政治默契，令其確信可以利用敦多布多爾濟等親清朝力量有效控制剛剛冊封的小呼圖克圖，也有助於強化大清同喀爾喀之間的聯繫與認同。在這一新的政教佈局中，二世哲布尊丹巴的佛教權威，正從蒙藏佛教原有的「政教二途」模式的權力主體轉變為一種政治工具。藏傳佛教的王權觀開始嵌入到清朝政治秩序中，或者說是黃教之教權逐漸被納入到傳統皇權模式之下。

此後，隨著政局穩定、財力充足，加之此前策妄阿喇布坦去世，準噶爾內部出現汗位之爭，雍正帝認為這是一舉解決西北邊疆問題的大好時機，遂開始籌劃用兵事宜。雍正七年，岳鍾琪、傅爾丹分兵西、北兩路進軍準噶爾。¹⁰¹ 一直膠著至雍正九年，結果清軍在和通泊 (*qoton nor*) 之戰中幾乎全軍覆沒。以致有學者認為這是大清鐵騎在十九世紀面對西方軍隊之前所遭受的最為慘重的一次失敗。¹⁰² 對於這次戰役已有清史學者據軍機處檔案予以較為詳細地揭示。¹⁰³ 除了軍事層面，此事與佛教亦有牽涉。

和通泊之戰後不久，雍正帝接到侍衛巴雅思護朗 (*bayashūlang*) 送來的情報：「聽聞先前北路來犯賊兵消息，正於山上安營扎寨，欲移居小呼圖克圖 (*ajige kūtuktu*) 及眾喇嘛。」遂於該年九月初九日諭令軍機處擬旨：

呼圖克圖者乃喀爾喀七旗共同供奉之大喇嘛，最關緊要。敦多布多爾濟應特留心，派人遠探。倘獲知賊兵來侵庫倫之信，著額駙敦多布多爾濟率小呼圖克圖及其奶公、奶母，再附近全部稍大喇嘛與屬眾 (*ambaka lama šabisa*)，自克魯倫 (*kerlun*) 向東遠移至多倫諾爾 (*dolon noor*) 居住，其餘喇嘛、屬眾照例仍居庫倫。將此意先告予敦多布多爾濟，不可使任何人

¹⁰¹ 馮爾康，〈雍正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 345-357；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40-255.

¹⁰² James A. Millward and Peter C. Perdu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Xinjiang Region through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ed. S. Frederick Starr (Armonk: M. E. Sharpe Inc, 2004), p. 52.

¹⁰³ 張建，〈和通泊之役與大清國的邊務危機——以軍機處滿文檔案為中心的考察〉，編委會選編，《紀念王鐘翰先生百年誕辰學術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頁 445-467；張伯國，〈和通泊之戰研究三題〉，《中國邊政》211 (2017)：133-144。

知。現暗中囤備糧穀，若有賊兵消息，不致貽誤時機。甚密 (umesi narhūšakini)，照此亦使丹津多爾濟知曉。¹⁰⁴

正是這一消息讓雍正帝預感到二世哲布尊丹巴正在成為準噶爾攻掠喀爾喀的重要目標，從而萌生移居小呼圖克圖的想法，並且制定了內遷至多倫諾爾的初步謀劃。十月初一日，順承親王 (dahashūn cin wang) 錫保又奏：據從準噶爾處逃回之俘虜稱，在噶爾丹策凌興兵時，原本在喀爾喀境內駐牧且歸附大清的土爾扈特部墨爾根綽爾濟 (mergen corji) 和輝特部公巴濟 (baji) 已率眾投入準部，而且大、小策凌正奉命掠奪喀爾喀部牧場。更為關鍵的是，錫保在這份奏摺中再次提到準噶爾打算「請格根呼圖克圖於杭愛過冬 (gegen hūtuktu be solifi hanggai bade tuweli hetukini)」。¹⁰⁵

如果說劫掠牧場還只是一城一地之得失，那麼脅迫哲布尊丹巴前往準噶爾則無異於釜底抽薪，很可能影響到喀爾喀各部之向背。在得到錫保的情報後，雍正帝開始著手實施移居哲布尊丹巴的計劃。此舉或可謂「故技重施」，自雍正五年衛藏戰爭爆發以及準噶爾覬視西藏以來，雍正帝因擔憂準噶爾挾持七世達賴喇嘛以藉助其教權影響蒙藏政局，先後將七世達賴內遷至理塘、泰寧等處居住，並派重兵守護。¹⁰⁶ 這次移居的對象則換成了已被抬高至與達賴喇嘛同等地位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十月二十七日，雍正帝下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甚年幼，達錫吹木丕爾托音亦甚年邁，今值準噶爾猖獗之際，你們身居庫倫，心情不安……將呼畢勒罕、達錫吹木丕爾托音徐徐遷移至多倫諾爾廟居住。」¹⁰⁷ 軍機大臣在議覆中一面表示「理應遵旨，甚為妥當」云云，同時也提出具體遷移方案還需與喀爾喀商定，如：「呼圖克圖之徒弟、屬下人等甚眾，此番遷移時，應帶來幾何，剩餘人等如何辦理之處，密咨王丹津多爾濟、額駙敦多布多爾濟，俟伊等詳議具奏。」¹⁰⁸

¹⁰⁴ 雍正九年九月初九日諭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上諭檔，檔號 03-18-009-000001-0002-0118。另《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一一〇，雍正九年九月辛未（十一日），亦載：「諭大學士等，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乃七旗喀爾喀供養之大喇嘛，額駙敦多布多爾濟可加意防備，若賊人有來侵庫倫之信，將胡土克圖遠避，來至多倫腦兒居住。」（頁 463）應即此滿文諭旨的節譯。

¹⁰⁵ 雍正九年十月初一日錫保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錄副檔，檔號 03-0173-1106-007。

¹⁰⁶ 拉科·益西多傑，《藏傳佛教高僧傳略》（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頁 455。

¹⁰⁷ 雍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豐盛額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錄副檔，檔號 03-0173-0778-002。

¹⁰⁸ 雍正十年正月十九日丹津多爾濟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 2089。

喀爾喀副將軍丹津多爾濟接到咨文後，與額駙敦多布多爾濟會議出遷移方案，奏云：

酌情共率喇嘛、徒弟、屬下人等八百多，青草早萌芽則四月，遲萌芽則五月，諏吉啟程。此處所餘喇嘛、徒弟、屬下人等，照常留於伊布爾噶勒泰 (burgaltai) 等處，著堪布諾門罕、商卓特巴旺楚克多爾濟留此總管。¹⁰⁹

與此同時，丹津多爾濟還提出了一個擔憂：

自令呼畢勒罕坐床以來，我喀爾喀汗王等以下至台吉屬下等，俱如對先呼圖克圖一般誠摯禮敬，倘往軍前或往他項官差，啟程前得暇，定要來庫倫，叩拜呼畢勒罕而去；俟返回家中，亦必來庫倫叩拜呼畢勒罕。目下賊俱返回之際，倘將呼畢勒罕、達錫吹木丕爾托音遷居多倫諾爾廟，因我喀爾喀眾民未聞聖主此妙算周全而頒下諭旨 (ejen i ere akvmbume bodoifi, wasimbuha ferguwecuke hese be donjihakū ofi)，賊倘若猝然潛來侵掠，兵丁雖俱赴邊界，一時不能保護，不知所涉最關緊要，惟以呼畢勒罕遠居而眷戀，恐生胡亂懷疑之心。¹¹⁰

所謂「未聞聖主此妙算周全而頒下諭旨」是指雍正帝為防範準噶爾搶奪哲布尊丹巴而提前作出的遷移準備果然應驗，只是這些軍機對於喀爾喀的普通民眾來說並不知情。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作為喀爾喀的宗教領袖，要為各部提供法施福田。如果貿然將其移居漠南，很可能引起信眾的誤解和混亂。而且一旦準噶爾前來侵襲，附近兵丁也難以有效馳援。因此建議改為先向喀爾喀說明情形，而後再行遷移之事。對此，雍正帝硃批云：「所奏甚是，朕原意亦先向爾等密取意見，再令議眾意如何。」¹¹¹ 對於移居哲布尊丹巴可能引起喀爾喀的不滿，雍正帝或有思想準備，因此才會先向敦多布多爾濟和丹津多爾濟等人「密取」意見，並一再叮囑「甚密」。¹¹² 此前，敦多布多爾濟在雍正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的奏摺中雖表示對遷移哲布尊丹巴呼畢勒罕的訓諭將欽遵奉行，但也說到：「今年兩次聽聞

¹⁰⁹ 雍正十年正月十九日丹津多爾濟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 2089。

¹¹⁰ 雍正十年正月十九日丹津多爾濟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宮中滿文硃批奏摺，檔號 04-02-002-000166-0006。

¹¹¹ 雍正十年正月十九日丹津多爾濟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 2090。

¹¹² 雍正九年九月初九日諭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上諭檔，檔號 03-18-009-000001-0002-0118。

賊寇消息，恐因遷移而致喀爾喀各部混亂。」¹¹³ 透露出喀爾喀對遷移哲布尊丹巴潛在的反對意見。在此情況下，既能實際控制年幼的二世哲布尊丹巴，又親近清朝的敦多布多爾濟和丹津多爾濟等喀爾喀貴族的作用便顯現出來，正是在他們的共同商議和支持下，遷移哲布尊丹巴之事得以最終實現。

艾鴻展借用 David Cannadine 在分析大英帝國統治時提出的「裝飾主義」(ornamentalism) 理論類比滿洲統治者對蒙古人身分認同的轉化，指出大清皇帝通過自己的恩典，將「王、貝勒、貝子、公」這套新的頭銜和榮譽授予蒙古各部貴族，使其變成各旗的精英。在十八世紀末，被納入清朝裝飾主義等級制度的（內）蒙古人的政治權威概念和部族認同已明顯改變。¹¹⁴ 與滿洲統治者聯姻、並且獲封親王頭銜的敦多布多爾濟等人的言行表明，在十八世紀初的喀爾喀蒙古，類似的情況已經出現。岡洋樹在討論清代蒙古盟旗制度時更注意到，清廷為削弱喀爾喀汗的權威，於正副盟長之外，增設喀爾喀副將軍一職，刻意選拔各汗部中的「傍系／傍流」王公擔任。¹¹⁵ 前文的策凌、此處的丹津多爾濟，皆屬此類。對他們個人來說，大清不僅是其軍事權力的來源，更成為身分認同的核心。因此，無論是選定抑或移居哲布尊丹巴靈童，這些蒙古地方精英都成為清廷管理喀爾喀政教事務的重要同謀和實際執行者。

這份奏摺的最後，丹津多爾濟還說道：「呼畢勒罕年幼，既然不能即刻離其母，則遷移呼畢勒罕時，請將其母亦一併遷移。」而雍正帝卻表示自己已向敦多布多爾濟表達了母子一同移居的意思，「曾諭攜其家產，與呼圖克圖同往」，只

¹¹³ 雍正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敦多布多爾濟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錄副檔，檔號 03-0173-1024-003。敦多布多爾濟奏摺中表示欽遵奉行之「訓諭」應即前引雍正九年九月初九日諭旨。

¹¹⁴ Elverskog, *Our Great Qing*, pp. 63-89. 對於用該理論解釋大清帝國的必要性與有效性之批評，參看 Ishihama Yumiko, “Review of *Our Great Qing: The Mongols, Buddhism, and the St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y Johan Elverskog,”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8 (2008) : 511-516。此外，本書雖集中討論科爾沁蒙古的大清認同，但作者在第三章根據康熙二十六年蒙古堂檔冊中康熙帝就車臣汗位事宜分別致書達賴喇嘛和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材料，認為此舉表明清帝成為包括佛法在內的喀爾喀地方權威的唯一仲裁者 (pp. 75-79)。筆者認為將此結論置於十七世紀末的喀爾喀蒙古為時尚早。因為至少在同月，康熙帝還收到墨爾根濟農 (mergen jinong) 來信，由達賴喇嘛賜號濟農的墨爾根在信中抱怨並未獲得達賴賜號的朋楚克 (punčoy) 竟也能受封扎薩克，表明達賴喇嘛授予稱號、印信在當時蒙古地方精英權力觀念中的重要性。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編，《清內閣蒙古堂檔》（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第 6 冊，頁 54-56。

¹¹⁵ 岡洋樹，《清代モンゴル盟旗制度の研究》（東京：東方書店，2007），頁 91-101。

是這位糊塗的額駙似乎並未在意，由此又遭到皇帝奚落。¹¹⁶ 或許是雍正帝對敦多布多爾濟仍放心不下，至雍正十年二月初九日，雍正帝又發諭旨明確指示四額駙敦多布多爾濟不必前往軍中效力，應當攜帶家口財產前往多倫諾爾看護其子哲布尊丹巴。¹¹⁷ 而且在哲布尊丹巴遷居多倫諾爾之後，雍正帝再次叮囑看護哲布尊丹巴遷移茲事體大，可以暫時不要來京陛見。¹¹⁸

或許是為了安撫哲布尊丹巴及喀爾喀王公，雍正十年二月二十日，雍正帝派遣御前侍衛前往庫倫問候哲布尊丹巴，並貢獻哈達、絲綢。¹¹⁹ 同時對其在庫倫營修廟宇所需之工料給予大力贊助，撥給牲畜往來運送。¹²⁰ 在各項細節商定議奏之後，雍正十年閏五月，小喇嘛和其母親一起從庫倫前往多倫諾爾。該月二十日丹津多爾濟奏云：

今年亢旱，青草未長出，無計而等候，頃自五月二十五日始相繼微雨，青草方萌發。故於閏五月二十二日，呼畢勒罕本人、達錫吹木丕爾托音共同動身，向多倫諾爾廟緩慢遷移。今達錫吹木丕爾托音本人礙於年高，較前甚弱，且此間相繼患病，飲食、睡眠銳減。若能登程，則與呼畢勒罕共同啟程外，倘不能行，則令呼畢勒罕本人啟程。¹²¹

就在這份奏摺發出僅數天尚在馳往京師的路途當中（據軍機處錄副記載該奏摺於六月初三日抵京），雍正帝再次下旨：據岳鍾琪奏報，準噶爾二策凌敦多卜(juve ceringdondob)聚兵三萬欲往喀爾喀搶奪哲布尊丹巴，為防其聲東擊西，命錫保分兵駐守各卡倫前哨。¹²² 此前一個月，岳鍾琪從準噶爾俘虜處獲得情報，他們聽聞小策凌敦多卜「在奇蘭木地方聚兵三萬，隨帶至今年十月的口糧，俟馬

¹¹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 2090。

¹¹⁷ 雍正十年二月初九日諭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上諭檔，檔號 03-18-009-000003-0001-0023。

¹¹⁸ 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諭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上諭檔，檔號 03-18-009-000003-0002-0154。

¹¹⁹ 雍正十年二月二十日諭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上諭檔，檔號 03-18-009-000002-0001-0089。

¹²⁰ 雍正十年七月初十日鄂爾泰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錄副檔，檔號 03-0173-0779-002。

¹²¹ 雍正十年閏五月二十日丹津多爾濟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錄副檔，檔號 03-0173-0187-03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 2126。

¹²² 雍正十年閏五月二十四日諭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上諭檔，檔號 03-18-009-000003-0001-0107。

匹牲畜肥壯時候，或從布拉漢一路，或從布魯爾一路行走，去請喀爾喀供奉的大喇嘛至克爾倫一帶地方去」。¹²³ 這裡的大喇嘛即指二世哲布尊丹巴。彼時清廷與喀爾喀尚未議定遷居方案，為確保哲布尊丹巴的安全，雍正帝遂有此軍事部署。不久後，又命軍機大臣鄂爾泰等議奏於多倫諾爾增設官員看護哲布尊丹巴具體事宜。¹²⁴ 當雍正帝接獲丹津多爾濟奏摺後，諭令王扎木巴拉札卜 (*jambala jab*) 率駐達里崗愛 (*dariyanya*) 兵丁前往克魯倫一帶迎接護送哲布尊丹巴；命護軍統領八十前往多倫諾爾為哲布尊丹巴一行準備宴席；此後還曾命欽差看護哲布尊丹巴之護衛於多倫諾爾附近緝盜，務必確保此地安全。¹²⁵ 又考慮到目下準噶爾軍已撤出喀爾喀，且達錫吹木丕爾托音年事已高，准許緩行，稍後再至多倫諾爾與哲布尊丹巴會合。¹²⁶ 此時，一則呼畢勒罕人選業已塵埃落定，二則雍正帝所真正關切的乃是哲布尊丹巴所代表的宗教權威，故而對達錫吹木丕爾托音是否一同內遷也就不太在意了。

哲布尊丹巴一行移居多倫諾爾之後，欽差看護的二等侍衛黑雅圖 (*hiyatū*) 奏報小喇嘛來此水土不服，於是請往多倫諾爾以北七十里處紮營居住。此事經軍機大臣豐盛額等議奏認為可行。加之此時額駙敦多布多爾濟也奏請安置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至多倫諾爾之眾僧民。雍正帝遂於十一月二十九日下旨准其所請，將哲布尊丹巴之沙彌等眾移居商都 (*šangdu*) 河附近。¹²⁷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遷居，相當程度上意味著喀爾喀蒙古宗教中心的轉移，因為很快就開始有各地信眾前往多倫諾爾禮拜活佛，據看護哲布尊丹巴的二等侍衛常吉圖 (*canggitu*) 奏報：

¹²³ 雍正十年五月十一日岳鍾琪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第 22 冊，頁 276-281。

¹²⁴ 雍正十年七月十四日鄂爾泰等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錄副檔，檔號 03-0173-0779-002。

¹²⁵ 雍正十年七月二十五日、八月初九日諭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上諭檔，檔號 03-18-009-000003-0001-0132、03-18-009-000003-0001-0142；雍正十年十月二十二日黑雅圖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錄副檔，檔號 03-0173-1031-009。

¹²⁶ 雍正十年八月二十八日諭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上諭檔，檔號 03-18-009-000003-0001-0162。

¹²⁷ 雍正十年十月十三日黑雅圖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錄副檔，檔號 03-0173-1031-007；雍正十年十月二十二日豐盛額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錄副檔，檔號 03-0173-0778-003；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日敦多布多爾濟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錄副檔，檔號 03-0170-0125-005；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諭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上諭檔，檔號 03-18-009-000003-0002-0155。

「前來禮拜多倫諾爾廟宇的蒙古部眾每天或有數千人之多，而且還有逗留數月不離去之人」，他因此擔心有匪類混跡其中而難以稽查，遂奏請當地同知嚴加巡查，不許禮佛之人在此久住。¹²⁸ 這反映出哲布尊丹巴在蒙古各部中的重要地位，即便是一位尚不能離開母親的小喇嘛，依然擁有無數尊崇者；同時也透露出雍正帝遷移哲布尊丹巴呼畢勒罕至此的真實用心。驅逐久住信眾實在與所謂弘揚教法云云相背離，但卻是將佛教權威納入清朝權力系統的重要一環，是出於清廷對準噶爾搶奪哲布尊丹巴進而攻掠喀爾喀的擔憂和戰略防備。

雍正帝在二世哲布尊丹巴事宜上的審慎態度，說明佛教作為權力主體對於大清政權之重要性；而清廷在決策其人選和遷移事情上的強勢地位與歷史結果，則表明喀爾喀既有的「佛教政治」體系正受到大清衝擊和改造。如果說康熙朝的多倫諾爾會盟以及扎薩克旗的設立，意味著滿洲與喀爾喀在政治權力地位上的改變；那麼，作為喀爾喀最高宗教權力象徵的哲布尊丹巴依靠雍正帝的冊封而獲得合法性，又在其敕諭之下被動移居，則佛教權力的「層級」和「結構」至遲在雍正朝也已然改變。而支持並促成該變化的正是那些深受皇恩、認同大清國的蒙古貴族們。我們在討論「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的是非的同時，也應當注意到大清通過蒙古精英對喀爾喀佛教事務不斷施加影響與控制的事實。

魏源《聖武記》中「聖祖墾之，世宗耨之，高宗獲之」的歷史敘述雖是針對清廷「西北周數萬里之版章」而言，但對包含其中的蒙藏佛教之經營同樣適用。¹²⁹ 雍正一朝雖短，卻是將佛教權力納入清帝國統治秩序的關鍵階段，是謂「耨之」。這其中固然有軍事勝利而形成的政治優勢作為基礎，如平定青海和碩特蒙古的「叛亂」；也有制度性建設作為保障，如設立商卓特巴衙門。但較諸其父康熙帝、其子乾隆帝，雍正帝的武功並不特出。那麼，原本在喀爾喀政教格局中佔據半壁江山的佛教權威之所以能在雍正時期被納入清廷權力體系，也許並不是伴隨「國力」之增強而理所當然地發生改變。其中或有一定的歷史偶然——蒙藏最具影響力的四位格魯派活佛，除班禪額爾德尼外，達賴喇嘛、章嘉呼圖克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世系都在雍正朝發生了轉世且面臨呼畢勒罕人選認定的危機。

¹²⁸ 雍正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常吉圖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錄副檔，檔號03-0173-1033-009。

¹²⁹ 魏源，《聖武記》（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02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卷三，頁283。

先後內遷理塘、泰寧的七世達賴，在梅檀寺被雍正帝抱入懷中的三世章嘉，¹³⁰ 還有本文所討論的藉由清廷背書而具有合法性的二世哲布尊丹巴，其宗教權力皆因呼畢勒罕年幼而中斷，甚至亟需清廷的冊封以為護法。如此，便為大清政教權威的全面建立提供重要機緣。相較於當時年長且身居後藏的五世班禪，上述三位新立定的呼畢勒罕在面對政治成熟的「大皇帝 / 聖主」(yeke boyda ejen / enduringge ejen) 時，惟有自稱「小呼圖克圖 / 小喇嘛」(ajige kūtuktu / buya lama)。¹³¹ 其意或本就年齒而言，卻也逐漸演變為權力關係的話語展現。

那麼，從十八世紀開始，面對大清新的統治模式，傳統蒙藏佛教王權觀在喀爾喀的處境如何？從本文所論清廷、哲布尊丹巴、喀爾喀蒙古三者之間的政教權力結構來看，清廷冊封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啟法澤卜尊丹巴喇嘛」(šajin be mandubure jebzundamba lama)，¹³² 將其抬升至與達賴、班禪同等的宗教地位。一方面，在邊疆未定的局勢下，當二世哲布尊丹巴逐漸成為喀爾喀蒙古最高佛教領袖，加之其土謝圖汗部嫡裔血脈，繼承並延續了一世哲布尊丹巴所建立的政教權威，喀爾喀內部各扎薩克旗間的身分認同也得到加強。這一傳統的力量至少是與盟旗制度同時存在。另一方面，哲布尊丹巴世系地位的提高，也是自康熙朝後期開始的消解五世達賴喇嘛「佛教政治」影響力進程的延續。¹³³ 而新的佛教權威崛起取代舊的佛教權威，這一邏輯本身是否仍在「佛教政治」的框架之內？至於乾隆帝的「菩薩王」示現，是否算是舊有模式的新應用？¹³⁴ 這些問題仍值得深入研究。此外，到乾隆朝，二世哲布尊丹巴因在喀爾喀青滾雜卜事件中表現曖

¹³⁰ 土觀·洛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頁 27。

¹³¹ 檔案中「小喇嘛」或「小呼圖克圖」的漢滿文用例多為清代官員或皇帝本人，但亦有活佛自稱的情況。如雍正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鼐格等奏摺引述七世達賴謝恩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錄副檔，檔號 03-0173-0943-002。此外，七世達賴喇嘛在寫給雍正帝的藏文文書中，除尊稱雍正帝為「大皇帝」(bdag po chen po)，亦自稱為「小」(chung ngu)，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七世達賴上雍正帝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132199-001。

¹³² 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德勒克多爾濟咨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錄副檔，檔號 03-0204-4279-021。對哲布尊丹巴尊號演變的討論，參看 Baboo, *cīng ulus kīged jībzundamba qutuytu*, pp. 151-155。

¹³³ 關於五世達賴喇嘛佛教政治思想的描述及其影響，參看石濱裕美子，《チベット仏教世界の歴史的研究》，頁 71-138；齊光《大清帝國時期蒙古的政治與社會》，頁 26-65。

¹³⁴ 石濱裕美子，《清朝とチベット仏教——菩薩王となった乾隆帝》（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2011），頁 207-226。

昧，引起乾隆帝猜忌，更讓清廷意識到，哲布尊丹巴教權的抬頭也極易導致喀爾喀蒙古勢力過大。因此在其圓寂之後，乾隆帝「令」其靈童於藏地出生，而且再也未在蒙古轉世。然而藏地出生的三世哲布尊丹巴卻遭到喀爾喀的抵制。蒙古方面策劃將其移住多倫諾爾以遠離喀爾喀，甚至發生了喀爾喀喇嘛迫害年幼呼圖克圖的事情。¹³⁵ 這些近乎悖論式的矛盾局面也反映出清朝在處理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與喀爾喀蒙古之間關係的困境，並且淹延清末，八世哲布尊丹巴博克多汗趁辛亥革命之機，短暫實現了一世格根試圖在喀爾喀蒙古建立宗教與世俗權力合一的「佛教政治」的願望。此是後話，這裡不再討論。

六・結語

通過對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畢勒罕相關傳記文本和檔案的梳理，我們可以粗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自從羅布桑普棱列於十八世紀初為一世哲布尊丹巴寫作傳記以來，以此為藍本，至十九世紀中葉，諸多關於歷輩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合傳」陸續誕生。根據撰述立場和目的，這些傳記可大致被分為兩類。一類是具備官方色彩的「史傳」，除記錄歷輩哲布尊丹巴源流及生平外，還存錄有關清廷的印敕、諭旨、咨文等官方往來文書，並由哲布尊丹巴商卓特巴衙門等機構向中央政府呈報備案。另一類是帶有宗教情感的「聖傳」，由蒙藏喇嘛完成，多關注歷代哲布尊丹巴在宗教層面的言教和神蹟，因充滿神話色彩，情節也更為生動豐富。大部分傳記並非一人或一時所作，而是具有「續纂」和「層累」性質。這些傳記多以抄本形式流傳，版本眾多，各文本間既有內容詳略的差異，也存在因襲借鑒之聯繫。其中圍繞二世哲布尊丹巴呼畢勒罕人選及其認定經過的記載，便體現了傳記文本之間的演變痕跡。一世哲布尊丹巴托夢雍正帝、西藏喇嘛預言轉世靈童人選等情節，應受到納吉旺布所作藏文傳記《善緣信者之車》和《白蓮美鬘》的影響；而二世哲布尊丹巴具體的出生時間和地點、雍正帝賞賜沿途驛站之諭旨，則較先出現於《聖上源流》和《第一世博格達哲布尊丹巴喇嘛名號及初建扎倉祈願佛教永駐》一類官方文獻中。大體上，愈晚出的傳記，細節愈豐富，尤以咸豐九

¹³⁵ 岡洋樹著，蔡鳳林譯，〈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三世的轉世及乾隆帝對喀爾喀的政策〉，《世界民族》1993.5：58-63；趙雲田，〈哲布尊丹巴和清朝對喀爾喀蒙古的統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清代蒙古高僧傳譯輯》，頁351-371。

楊奇霖

年佚名《哲布尊丹巴傳》為集大成之代表，而波茲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所載則是對此類傳記和蒙古當地傳說的進一步彙集。

第二，各傳記文本圍繞二世哲布尊丹巴呼畢勒罕選定一事而不斷增飾的情節，並非完全來自坊間對於政治秘聞的想像或出於宗教情感的聖傳式書寫。相反，傳記及傳說中涉及的諸多故事元素與細節內容，都可以從今存清代檔案中找到更早的來源。喀爾喀副將軍策凌在其分別寫於雍正四、五年的奏摺中稱：喀爾喀希望能借用清朝的驛道，派遣使者攜帶寫有四名靈童候選人的名單前往西藏，請眾喇嘛護法神確認哲布尊丹巴呼畢勒罕。然而在得到西藏喇嘛預言敦多布多爾濟之子為哲布尊丹巴轉世的結果時，喀爾喀眾扎薩克卻質疑其真實性，並有各自另立呼畢勒罕的打算，於是親清朝的喀爾喀貴族請求清廷定奪。在這些檔案中不難發現各類傳記文本中喀爾喀蒙古各部間的競爭、四名靈童候選人、皇帝賞賜驛站、西藏喇嘛的神諭等要素。而雍正帝在硃批中提到了自己的夢境，雖然未必是指老格根托夢，但顯然與後來傳記中皇帝據夢境作出最終裁定這一情節存在聯繫。此外，奏摺還提到在喀爾喀使者到達西藏前，藏人已在傳揚活佛將轉生於四額駙家中，似乎也對應著傳記中一世哲布尊丹巴的遺囑安排。檔案與聖傳之間的緊密聯繫表明清朝對喀爾喀的影響已進入到文化記憶和歷史書寫層面。

第三，哲布尊丹巴傳記與清代檔案文獻之間的關聯，不僅有助於我們梳理傳記文本的來源和演變，也反映出在二世哲布尊丹巴人選角力背後是清朝和喀爾喀蒙古之間的政教互動。雍正帝認定額駙敦多布多爾濟之子作為轉世靈童，便支持了西藏眾法主所作的認定結果，表明他尚無意挑戰西藏在活佛轉世上的宗教權威；同時，面對喀爾喀內部的質疑之聲，雍正帝也沒有打破由土謝圖汗部所主導的既定人選框架，從車臣汗部或扎薩克圖汗部中另尋呼畢勒罕，而是對哲布尊丹巴繼續轉生於土謝圖汗部的事實進行背書。其深層的考量可能有三：首先，敦多布多爾濟作為額駙，與滿洲皇室關係親近，政治上傾向清朝。其次，敦多布多爾濟是革退汗王，並無實權，而且能力平庸、身體多病，容易為清廷所掌控。最後，藉助敦多布多爾濟和二世哲布尊丹巴的影響可以牽制土謝圖汗旺扎爾多爾濟之勢力，不致喀爾喀教權和政權結合，威脅清朝統治。

第四，雍正帝在二世哲布尊丹巴呼畢勒罕選定過程中「終審者」的身份表明在喀爾喀蒙古歸附三十餘年後，清廷早已介入並足以左右其政務；而藉助呼圖克圖轉世之機，更將此影響拓展至宗教領域。當政治成熟的「大皇帝」面對年幼的「小喇嘛」時，這種影響得以進一步加深。特別是雍正十年，在對準噶爾作戰失

清朝與喀爾喀蒙古的政教互動（1723-1733）

利的局面下，為防範噶爾丹策凌借機劫掠二世哲布尊丹巴，雍正帝效法內遷七世達賴喇嘛的做法，將其從庫倫遷居至多倫諾爾，以此鞏固對這一政教資源的掌控和利用。雖然此舉存在引發喀爾喀部眾誤解或混亂的風險，但雍正帝提前與喀爾喀蒙古親清朝力量密謀，並在其協調安排下最終成行，直到乾隆朝才得以請旨返回。至此，作為喀爾喀蒙古最高宗教領袖的哲布尊丹巴被納入清朝權力秩序中，成為清廷統治並管理漠北蒙古的重要一環。

（本文於民國一一〇年六月十八日收稿；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通過刊登）

後記

拙文的增訂與修改，承蒙二位匿名審查人以及史語所集刊編委會提供諸多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楊奇霖

附錄：十九世紀蒙古唐卡中的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傳記故事



圖一：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唐卡
(局部)，約十九世紀¹³⁶



圖二：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唐卡
(局部)，十九世紀

¹³⁶ 圖一、圖二皆轉引自 Haderer,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世宗憲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高宗純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
- 《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24 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 《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收入包文漢、奇·朝克圖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第 1 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8。
- 《聖祖仁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
- 土觀·洛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132199-001。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起居注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上諭檔。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錄副檔。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宮中滿文硃批奏摺。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合肥：黃山書社，1998。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編，《清內閣蒙古堂檔》，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第 6 冊。
- 烏雲畢力格、散·楚侖編，《蒙古國藏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蒙古文傳記彙集》，赤峰：內蒙古科學技術出版社，2020。
- 清理藩院編，趙雲田點校，《乾隆朝內府抄本《理藩院則例》》，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
- 無名氏著，申曉亭、成崇德譯註，〈哲布尊丹巴傳〉，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編，《清代蒙古高僧傳譯輯》，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頁 217-256。
- 黃成垿口述，陳篠筆譯，《蒙古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
- 魏源，《聖武記》，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102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楊奇霖

- Bawden, Charles R. *The Jebtsundamba Khutukhtus of Urga: text, translation and notes.* Wiesbaden: O. Harrassowitz, 1961.
- Čendin-a sudulun (Публикация Цэндиной), emkidkebe. *erdeni juu-yin teüke.* 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7。
- Dzaya pandita blo bzang 'phrin las. “Rje btsun dam pa blo bzang bstan pa'i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i 'khrungs rabs bco lnga'i rnam thar.” In *Life and Works of Jebtsundampa I*, edited by Lokesh Chandra. New Delhi: Sharada Rani, 1982, pp. 412-549.
- Ngag dbang ye shes thub bstan. “tügemel-ün ejen mandal-un itegel rje bčun dam ba blo bzang bstan bai rgyal mčan-u čadig sayin qubitan-u süsüg-ün terge kemegdeküi orosiba.” In Hans-Rainer Kämpfe, “Sayin qubitan-u süsüg-ün terge: Biographie des 1. rJe bcun dam pa-Qutuqtu Öndür gegen (1635-1723), verfasst vor Ngag gi dbañ po 1839. 2. Folge.”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15 (1981): 331-382.
- Ngag dbang ye shes thub bstan. “skyabs mgon rje btsun dam pa rim po che'i sku phreng rim byon rnames kyi rnam thar mdo tsam du bkod pa pad dkar phreng mdos.” In *The Collected Biographies of Jebzundampa Khutugtu of Khalkha*, edited by R. Byambaa. Ulaanbaatar: R. Byambaa, 2006.
- Галдан. Эрдэнийн Эрих Хэмээх Түүх Болой. Улаанбаатар: Соёмбо Принтинг, 2006.
- Позднеев, Алексей Матвеевич.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Эрденийн Эрихэ».* Подлинный текст с переводом и пояснениями, заключающими в себе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Халхи с 1636 по 1736 г. СПб.: Тип. Имп. акад. наук, 1883.
- Позднеев, Алексей Матвеевич. *Монголия и монголы. Результаты поездки в Монголию, исполненной в 1892-1893 гг.* Т. 1: Дневник и маршрут 1892 года. СПб.: изд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96.
- Позднеев, Алексей Матвеевич. *Монголия и монголы.* Т. 2: Дневник и маршрут 1893 года. СПб.: изд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98.

二・近人論著

札奇斯欽

- 1991 《蒙古與西藏歷史關係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學報叢書編譯委員會。

清朝與喀爾喀蒙古的政教互動 (1723-1733)

伊·亞·茲拉特金著，馬曼麗譯

2013 《準噶爾汗國史（修訂版）》，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

李毓澍

1962 《外蒙政教制度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杜家驥

2013 《清朝滿蒙聯姻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杜齊著，李有義、鄧銳齡譯

1980 《西藏中世紀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室民族學室。

岡洋樹著，蔡鳳林譯

1993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三世的轉世及乾隆帝對喀爾喀的政策〉，《世界民族》1993.5：58-63。

拉科·益西多傑

2019 《藏傳佛教高僧傳略》，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

金成修

2006 《明清之際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的傳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阿·馬·波茲德涅耶夫著，劉漢明、張夢玲、盧龍譯

1989 《蒙古及蒙古人》，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胡斯冷

2014 〈戈拉登《寶貝念珠》史源與史料價值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蒙古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烏日圖

2011 〈哲布尊丹巴一世研究綜述〉，《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11.2：21-25。

2012 《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政治活動研究》，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

張羽新

1988 《清政府與喇嘛教》，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

張伯國

2017 〈和通泊之戰研究三題〉，《中國邊政》211：133-144。

張建

2013 〈和通泊之役與大清國的邊務危機——以軍機處滿文檔案為中心的考察〉，編委會選編，《紀念王鐘翰先生百年誕辰學術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頁 445-467。

楊奇霖

郭美蘭

2012 〈恪靖公主遠嫁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部述略〉，氏著，《明清檔案與史地探微》，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頁 213-224。

傅林祥等

2017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清代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馮爾康

1995 《雍正傳》，北京：人民出版社。

楊奇霖

2019 〈佛法與王法：佛教在清帝國身份認同中的作用——以康熙朝喀爾喀蒙古一世哲布尊丹巴為中心〉，釋妙江等主編，《身份認同及群體建構——第四屆五臺山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頁 216-256。

賈寧

2015 〈滿文題本揭示的清代蒙古各部貴族女性對爵位承襲事務的參與：以青海蒙古為中心的對比和分析〉，達力扎布主編，《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 8 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頁 83-95。

2017 〈清代文獻所見之蒙古婦女地位〉，《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0：231-249。

達力扎布

2015 《喀爾喀法規漢譯及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趙相璧

1990 〈簡論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清代蒙古高僧傳譯輯》，頁 372-383。

趙雲田

1990 〈哲布尊丹巴和清朝對喀爾喀蒙古的統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清代蒙古高僧傳譯輯》，頁 351-371。

齊光

2013 《大清帝國時期蒙古的政治與社會：以阿拉善和碩特部研究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釋妙舟

[1935] 2009 《蒙藏佛教史》，揚州：廣陵書社。

二木博史

2011 〈モンゴル語版『ジェブツンダンバ・ホトクト伝』について〉，《東京外國語大學論集》82：1-20。

清朝與喀爾喀蒙古的政教互動 (1723-1733)

石濱裕美子

- 2001 《チベット仏教世界の歴史的研究》，東京：東方書店。
2011 《清朝とチベット仏教——菩薩王となった乾隆帝》，東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岡洋樹

- 2007 《清代モンゴル盟旗制度の研究》，東京：東方書店。

宮崎市定

- 1950 《雍正帝》，東京：岩波書店。

森川哲雄

- 1985 〈外モンゴルのロシア帰属運動と第 2 代ジェプツンダムバ・ホトクト〉，《歴史学・地理学年報》9：1-40。

Agata, Bareja-Starzyńska

- 2010 “The Mongolian Incarnation of Jo nang pa Tāranātha Kun dga’ snying po: Öndör Gegeen Zanabazar Bio bzang bstan pa’i rgyal mtshan (1635-1723): A case study of the Tibeto-Mongolian Relationship.” *The Tibet Journal* 34/35: 243-261.

- 2015 *The Biography of the First Khalkha Jetsundampa Zanabazar by Zaya Pandita Luvsanprinlei*. Warsaw: Elipsa Dom Wydawniczy.

Baboo jokiyaba (八寶)

- 2019 čing ulus kiged jibzundamba qutuystu，北京：民族出版社。

Crossley, Pamela Kyle (柯嬌燕)

- 2009 “Review of *Our Great Qing: The Mongols, Buddhism, and the St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y Johan Elverskog.” *History of Religions* 49.1: 97-100.

Elverskog, Johan (艾鴻展)

- 2006 *Our Great Qing: The Mongols, Buddhism and the St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uang, Pei (黃培)

- 1974 *Autocracy at Work: A Study of the Yung-cheng Period, 1723-173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Ishihama, Yumiko (石濱裕美子)

- 2008 “Review of *Our Great Qing: The Mongols, Buddhism, and the St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y Johan Elverskog.”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8：511-516。

楊奇霖

Mi nyag mgon po (木雅貢布)

- 1996 “Ngag dbang ye shes thub bstan gyi rnam thar mdor bsdus.” In *Gangs can mkhas dbang rim byon gyi rnam thar mdor bsdus*, 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第 1 冊。

Millward, James A. (米華健), and Peter C. Perdue (濮德培)

- 2004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Xinjiang Region through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edited by S. Frederick Starr. Armonk: M. E. Sharpe Inc., pp. 27-62.

Oidtmann, Max (歐楊)

- 2018 *Forging the Golden Urn: The Qing Empire and the Politics of Reincarnation in Tibe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Okada, Hidehiro (岡田英弘)

- 1985 “Five tibeto-mongolian sources on the rje btsun dam pa qutuytus of urga.” 《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16 : 225-234。

Perdue, Peter C.

- 2005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sultemin, Uranchimeg

- 2020 *A Monastery on the Move: Art and Politics in Later Buddhist Mongol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Доржготовын, Дашибадрах

- 1995 “Өндөр гэгээний намтар оршвой.” In *Шагдарсүрэнгийн Сонинбаяр, Доржготовын Дашибадрах, Өндөр Гэгээний намтрууд оршивой*, edited by Шагдaryn Бира. Улаанбаатар: ШУА-ийн Эрдэм Компани.

Бонгард-Левина, Г. М.

- 2003 *Иконография Ваджраяны*. Москва: Дизайн. Информация. Картография.

三・網路資訊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

<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P259?uilang=bo>.

清朝與喀爾喀蒙古的政教互動 (1723-1733)

Haderer, Elisabeth

2012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rJe btsun dam pa Khutukhtus in Mongolian Buddhist Art.” In *The Arts of Tibetan Painting: Recent Research on Manuscripts, Murals and Thangkas of Tibet, the Himalayas and Mongolia (11th-19th century)*, edited by Amy Heller. <https://www.asianart.com/articles/haderer/index.html>.

Нацагдоржийн, Хатанбаатар

2017 “Монголын Их хүрээ хийд: аймаг ба дацан.” https://www.academia.edu/30971383/Ik_Khuree_khiid_aimag_ba_datsan_docx?auto=download.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ing Empire and Khalkha Mongolia, 1723–1733: The Selection of the Second Jebtsundamba and His Ordered Move to Dolon Nor

Qi-lin Y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Within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ng Empire and Khalkha Mongolia, the choosing of the Second Jebtsundamba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The most detailed account of this event has been recorded in the biography *Öndör gegen-ü namtar* (1859), details of which share similarities with the biographies of several other Jebtsundambas since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For example, the dream of the Yongzheng Emperor in which he saw the First Jebtsundamba as well as the Tibetan lamas' confirmation of the Khubilghan can be found in the Tibetan "sacred biographies" *bzang dad pa'i shing rta* (1839) and *pad dkar phreng mdzes* (c. 1848–1851) authored by ngag gi dbang po; moreover, for the birthdate and birthplace of the Second Jebtsundamba, one can refer to official biographies such as *Öndür gegen-ü uy eke* (1833) and *degereki-yin uy eki orosibai* (1853), as well as imperial decrees. But in fact, the elements that appear in the various biographies, including the rivalries between Khalkha nobles, the confirmation granted by the Tibetan lamas, the emperor's dream, and the post conferred by the Qing court, have an earlier source—the Manchu archives. These archives notably reflect the fact that the Qing court played the role of ultimate arbitrator when Khalkha tribes were in conflict. The Yongzheng Emperor chose the son of Dondub Dorji as the Second Jebtsundamba based on several factors: first, they were relatives-in-law; second, Dondub Dorji could restrict the power of Tüsheet Khan; and third, Dondub Dorji was deemed middling in his abilities, and thus, to be easily controlled by the Qing court. In the tenth year of the reign of the Yongzheng Emperor (1732), to prevent the Dzungar Khanate from abducting the Second Jebtsundamba, the emperor ordered him to move to Dolon Nor. Due to the Jebtsundamba being quite young, the Qing court achieved control over him, thereby ruling Khalkha Mongolia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religious authority wielded by the Jebtsundamba.

Keywords: the Second Jebtsundamba; Mongolian Buddhism; the Yongzheng Emperor; Khalkha Mongolia